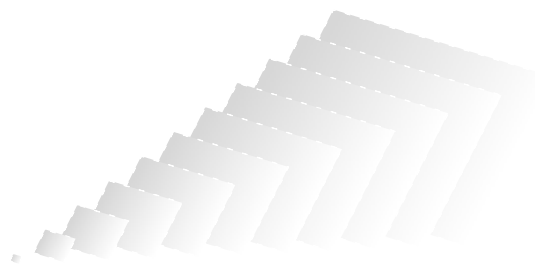


本期导读



编辑部

2017年12月16日,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滕雯同志为市直宣传文化系统作了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报告从关于大会的主题和主要成果、关于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关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八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十九大精神,对于当前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详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大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在亚欧两大洲之间建设一条新的大陆桥的构想。1985年,兰新铁路西段正式开始兴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多方面的关注。这条铁路即将形成的东方桥头堡在哪里?国家计委明确了连云港的桥头堡地位,但仍有一些港口城市对此虎视眈眈,要与连云港争夺桥头堡地位。《“桥头堡”之争》一文讲述了在国家有关部门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连云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将“桥头堡”这一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的伟大实践。

1940年9、10月间,八路军第115师决定在部队中普遍号召建设“铁的模范党军”,以建设模范党军为目标的整军运动在全师逐步展开。1941年6月底,115师师部移驻滨海根据地,决定利用八一建军节举行盛大军政大检阅活动。1941年8月1日拂晓,八路军第115师自改编以来最大规模的大阅兵在滨海根据地如期举行。详情参阅《抗战时期的滨海根据地军政大检阅》。

在海州辖内有个古老的城镇——石湫镇。它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险要,元代之前它是海州的海防要地,全国闻名。早在民国20年(1931年)它就入选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编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海州志中更是多有载述。历史上的海州石湫镇究竟在何处?面积有多大?《寻访石湫古镇》一文引经据典,加之作者亲入一线调查,谜底呼之欲出。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互鉴、文化交融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共同发展的倡议,更是文化对话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的得失成败,为方志编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厚的资源,同时也为我国的方志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的课题、新的领域大量呈现在方志工作者的面前。详情参阅《“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方志编纂创新》。

1



目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臻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 主任:徐勤飞
- 副主任: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一平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刘鹏 邱仕明
张再楼 张辉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 主编:徐勤飞
- 副主编: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 文字总校:张骏鹏

特载

- 0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大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
——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

/ 滕雯

历史与发展

- 09 赣榆名称由来新说与徐福东渡精神的传承 / 刘成文
12 “桥头堡”之争 / 薛广东
15 沈云沛与云雾茶 / 蔡立志

英烈风采

- 18 永恒的纪念
——追忆我市赣榆区海头镇李巷村梁氏家族6位烈士

/ 梁启平

党史研究

- 21 抗战时期的滨海根据地军政大检阅 / 王晓华

郁洲溯源

- 24 寻访石湫古镇 / 韩世泳
29 灌南第一所小学的前世今生 / 耿中太 韩翠林
31 刘善明首筑凤凰城 / 伏广喜



录

地方文化研究

- 32 孙佳讯谈板浦“二许”与李汝珍 / 许燕臻
34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五) / 刘凤桂

志鉴论坛

- 37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方志编纂创新 / 徐学鸿

人物春秋

- 39 心系桑梓的王公琦 / 张树庄

往事追忆

- 42 淮盐铁路运输
——追忆猴嘴盐业铁路 / 胡可明

风物览胜

- 44 赣榆许家花园 / 葛永明
45 大慈寺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六 / 孙大伟

附录

- 47 《连云港史志》2017年总目录 / 编辑部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古韵海州 诗赋名山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网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2017年第6期总第114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编者按:12月16日,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滕雯同志为市直宣传文化系统作了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报告从关于大会的主题和主要成果、关于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部署、关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八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十九大精神,对于当前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让全市史志系统的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本期特推出滕部长的宣讲报告(由于篇幅所限,前面七个部分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大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

——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

(2017年12月16日)

滕雯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站在历史和时代、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科学谋划和战略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学习宣传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学懂、弄通、做实”的明确要求。按照全市宣讲的统一安排,今天由我来给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干部作一次专场宣讲,主要讲八个方面问题。

一、关于大会的主题和主要成果(略)

二、关于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略)

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略)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略)

五、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略)

六、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部署(略)

七、关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略)

八、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深入学习贯彻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全力抓好面向全社会的学习宣传工作,又要扎实抓好自身的学习贯彻工作。十九大精神涉及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

涉及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份量很重,在十九大报告的多个部分都有体现。我们要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在实际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

一是充分认识思想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十九大报告强调,五年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社会思想舆论环境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明显改变。中央每年下发文件,通报情况、阐明立场、明确要求,出台党内法规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并纳入巡视安排,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履行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方向、管阵地、强队伍,旗帜鲜明站在一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把过去一些困扰人们的似是而非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把过去一些人不那么敢公开讲的原则要求讲得非常鲜明,为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根本性好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比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突出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在党校讲台、公开场合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应该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维护党校形象。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突出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特别是明确提出不能在实际工作中搞两个标准、形成脱节对立的“两个舆论场”,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要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真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突出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突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深刻阐明了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等重大关系,为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深刻把握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写入党章,这就意味着把文化提升到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强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统筹推进“五大建设”,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五大文明”全面提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基本内涵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中,突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报告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突出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提示了文化建设在全局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并从五个方面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具体部署。

当前,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更为繁重的任务。我们需要看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全局性的,对文化领域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日



益广泛,精神文化生活追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区域之间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供需矛盾,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比如,从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看,多样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市场经济逐利性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挑战、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对传统宣传管理方式的挑战、西方敌对势力遏制和渗透的挑战将长期存在,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较量依然激烈,一些人借机借题炒作攻击和宣扬错误思潮,境外非政府组织隐蔽渗透频繁,非法宗教活动影响冲击不可低估,社会负面情绪和心态有所滋长蔓延,意识形态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和松软现象。在前不久省委第二轮巡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地方和单位制度规定落实不到位,存在政治站位不高、党的领导弱化、发声引导不力、管理把关不严、工作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从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看,现在一方面社会更开放、更多元、更有活力,同时一些不道德行为、不文明现象也有所滋生蔓延。江苏省每年对道德发展状况进行年度测评显示,道德风尚高地建设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不同地区道德建设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不同领域的道德建设并不均衡,人文精神培育、政策法规保障等方面得分偏低,社会领域的道德发展相对滞后,一些道德突出问题虽下了大气力治理,但群众反映依然强烈。从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看,去年底我国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更加旺盛,数量上快速增长、质量上要求更高、结构上不断调整,需求的层次、内容、形式、主体等发生新变化,总体上从温饱型向享受型、知识型转变,从被动接受型向主动参与型转变。人们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多,文化需求规模进一步扩张,更趋多元多样、更加求新求特、更重交流分享;文化消费更加注重个性化、时尚化、体验性,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获取途径的便捷性要求更高;文化参与、文化表达、文化创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更加追求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追求精神上的获得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感。特别是科技的革命性进步为文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

们更多地借助科技来体验和享受文化、参与和创造文化、分享和传播文化。同时要看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个体之间文化需要的层次水平存在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与不断改善的物质生活还不完全适应。)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面临的要求更高,空间也更广阔,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

三是牢牢坚持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怎样坚持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这些总体要求,牢牢把握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就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科学界定,清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构成,讲清楚了我们文化的根脉和本原,讲清楚了我们文化的一脉相承性及其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我们要建设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源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是熔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土壤。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途径,具体地贯穿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中,贯穿到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发展中,贯穿到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吸收中。报告强调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报告强调“三个坚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强化大局观、全局观,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不断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增强其影响力和吸引力。

四是全面落实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十九大的部署要求,需要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把握新方位,以宽阔视野、长远眼光、系统思维研究新思路、探索新举措,更大力度、更高质量建设文化强市,更好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开拓文化发展的新境界。

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上要达到新高度。一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这是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要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中之重,在前一阶段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的基础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当前和未来相结合)、“三个贯通”(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同把握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要求,抓好中心组学习、党员干部培训轮训、冬训,发挥好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百姓名嘴”的作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学懂弄通,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和推动实践。二是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进一步加强主题策划,抓住重点、关注热点、对准焦点,讲好连云港故事、传播好连云港声音、推介好连云港形象。围绕推进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持续大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进一步创新内容生产方式,丰富内容呈现方式,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围绕提高内宣外宣组织化程度,组建成立新闻协调工作小组,健全落实新闻选题策划制度、新闻阅评工作机制、新闻通气会制度,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是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和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按照“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的总要求,大力实施“115 网信创新行动”,持续加强平台整合、舆情管控、网络安全保障,不断清朗网络空间。四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着力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追责问责

办法、巡视监督机制,确保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把方向、管阵地、强队伍的责任落实到位。

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上要取得新成效。关键是把握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个着眼点,解决好“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要在“融入”上下功夫,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着手出台《连云港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努力用法治手段和制度力量来强化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力,努力实现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实现城市治理效能与公民道德提升的相互促进。要在“引领”上下功夫,着力在宣传教育引导、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等方面,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家庭的基础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思路和办法,更好地推动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上要迈出新步伐。一是着力提升人民的思想觉悟,着眼坚定理想信念,用好用活港城历史文化、革命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资源,用好用活各类先进模范的教育资源,结合重要纪念日和节庆日,创新开展、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二是着力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探索新形式、建设新载体、打造新品牌,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从娃娃抓起,激励人们向上向善。三是着力提升人民的文明素养,以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围绕“爱、敬、诚、善”用情用心抓育人化人,促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更加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大中专院校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抓起来、强起来,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上要铸就新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面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要抓住这些重要时间节点规划推进重点创作项目,推动多出具有鲜明港城特色、厚重底蕴优势、广



阔宣传效应的精品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文艺工作者真正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让人民成为故事的主人、情感的主宰、思想价值的主旨。要着力提升文艺原创力，发挥好优秀文艺成果奖励作用，加强对原创基础性环节的扶持，推动传统与现代艺术形式相互借鉴、融合创新，推动用科技手段强化艺术表现，打造更多原创文艺精品。要充分发挥文艺品牌活动的展示推介和花果山文化奖的导向作用，大力培育和扶持高水平创作人才，推动攀登文艺高峰。

在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上要实现新突破。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探索符合连云港实际、顺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既有利于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又有利于强化党的领导和导向管理，有利于坚持社会效益首位、“两个效益”统一。二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丰富文化供给，推动设施相互贯通、资源统筹使用，促进精准惠民；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探索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化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优化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能。三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围绕“互联网+”“文化+”推进文化业态创新，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特色发展。四是加快推进文化走出去，围绕西游文化、徐福文化等港城特色文化，策划包装一批外宣项目，打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外宣产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强连云港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

五是自觉担当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明确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担当起这个使命，落实好这个要求，一要强化实践性，在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是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创造性的成果。但文化创造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结合实践、深入实践、研究实践，把创造建立在丰富、生动的实践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无比壮阔的伟大实践，只有关注这一实践、

参与这一实践、研究这一实践、反映这一实践，才能产生有助于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取得胜利的文化创造。二要强化时代性，在追随时代中实现文化进步。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期的文化都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为那个时代服务，在服务时代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进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文化必须顺着这个时代前进的足印，合着这个时代前进的节拍，去反映这个时代、讴歌这个时代、推进这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文化进步。三要强化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回答了我们的文化为谁兴盛、何以兴盛这一根本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人民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文化服务人民、文化讴歌人民、文化扎根人民、文化依靠人民，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责任重大、任务繁重。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在前一阶段组织集中报道和宣传宣讲的基础上，继续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各级各方面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市直宣传文化单位的党员干部要带头抓好学习，带头深入研讨，真正学深悟透、掌握精髓，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上当好表率。要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不断强化看齐中央、紧跟核心、拥戴领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系统谋划，积极探索创新，深入分析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开拓视野和思路、创新措施和办法，更加注重工作的协同性，不断提高工作的组织化程度。要深化自身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照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标准，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抓得更严更实，在新时代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为建设“强富美高”连云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连云港实践新境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赣榆名称由来新说 与徐福东渡精神的传承

刘成文



1990年12月落成的赣榆徐福像

徐福,是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扬帆东渡第一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和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拓者。徐福是赣榆人的骄傲和自豪。徐福为什么能够得到秦始皇的青睐和信任?徐福东渡精神对于今天赣榆发展的巨大现实意义有哪些?本文试着解开历史谜团,去探寻真实的赣榆徐福。

赣榆名称由来新说

赣榆一名之由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笔者认为,解开赣榆一名的奥秘,能够更深层次理解秦始皇东巡、徐福东渡的意义。要了解赣榆一名的由

来,必须联系距离赣榆大约60公里的羽山。

羽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海拔269.5米。不要看羽山孤零零地、默默无闻地矗立在那里,可是它背倚齐鲁,襟怀吴楚,是一座名垂青史的千古名山,是连云港市第一个见诸史书的地名。《尚书·禹贡》就有“淮沂其乂,蒙羽其艺”的记载。意思是说:“淮水、沂水得到治理,蒙山、羽山这些地区可以种植作物了。”说明早在4000年前这个地区就被称为“羽”了。

《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因此,羽山得名早于连云港地区任何一个地名。

为什么要提羽山?因为赣榆之“榆”,就是羽毛之“羽”。“赣”,从章从贡,“章”意为“站立在最前面”,“贡”指“向皇宫进献贡品”。古代赣榆,实际上是向朝廷进贡羽毛的地方。因为赣榆地区依山面海,沙鸥翔集,居住在这里的东夷部落,以打鱼、捕鱼为生。东夷的“夷”,即“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羽毛进贡到朝廷后,可以作为装饰品,可以作为做弓箭的材料。因此,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连云港地区向朝廷进贡的物品中仍然有“羽毛”一项。

再看最早记载羽山一名的上古文献《尚书·禹贡》。禹是中国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相传,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禹父亲鲧是被舜帝斩杀在羽山。“羽山殛鲧”在《史记》《山海经》《拾遗记》等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大意为:尧



舜之时，洪水滔天，蛇虫肆虐，黎民苦不堪言，鲧奉舜命治水，四年无功。舜在愤怒之下，在羽山将鲧斩首。鲧死的时候，尸体堕入“羽渊”，腹中窜出一条虬龙，这条虬龙就是禹。禹被授命继续治水，他总结其父教训，变堵拦为疏导，经过 13 年艰苦治理，疏通了九条大河，消除了天下水患，继舜位为王。其实，据专家考证，所谓“治水失败”只不过是舜斩杀鲧的一个借口，鲧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治理洪水，劳苦功高，因鲧与尧之子丹朱、舜争部落联盟共主之位失败，所以被舜流放至羽山。羽山是鲧的囚禁之地。

为什么要把鲧囚禁在羽山呢？因为羽山属于东夷部落所在地，舜就是东夷人。《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因此，鲧被囚禁在羽山，后来禹也出生在羽山。禹之所以称为“禹”，“禹”“羽”谐音，与出生在羽山有必然的联系。《禹贡》书名倒过来就为“贡禹”，意即“贡羽”，此即为“赣榆”一名的由来。

综上所述，赣榆得名，与榆树无关，来源于中国最早的朝廷公文，来源于治水英雄大禹王，来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座赫赫名山——羽山。

秦始皇两次东巡赣榆

秦代，羽山濒临大海，位于中国正东方，这座海边小岛和秦始皇东巡路线紧密相连。秦始皇五次出巡，以求长生不老之药，两次都是经过连云港地区。

第一次，公元前 219 年，在封禅泰山之后，“并渤海以东，过黄（今山东黄县）、脍（*chuí*，今山东福山），穷成山，登芝罘”。第二次，公元前 210 年，始皇又“从吴中，自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长江，沿海而北，抵琅琊台”。这两次并海北上的航线都要经过胸县。特别是第一次，从胶东北部芝罘南下琅琊，“留三月”，才有了徐福上书，由琅琊西南行经海曲到胸县，从胸港乘船入海至秦山岛，求仙勒石，再由胸港顺游水西北行至郯郡，然后去彭城。第二次，渡长江入邗沟运河，北上淮浦，由涟水入游水至胸县，由胸港乘船北上，“并海上，至琅琊”。

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为什么要两次东巡连云港地区？原因与秦的祖先起源于东方有密切关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传说时代起，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土上，就生息繁衍着许多古老的民族。华夏族起源于西北的陕甘地区，东夷族起源于东方的江淮吉水之间。后来，首先是华夏族向华北和东部黄淮地区迁徙，东夷族的一部分也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逐渐来到西北地区的汾渭流域。秦的祖先就起源于由东方西迁的东夷人。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指出，秦为嬴姓，与分布于淮济之间的徐、郟、莒、奄、终黎等十一个夷族古国为同族。王国维在一篇专门探究秦国都邑的文章中开头就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中有《秦为戎族》一节，专门阐讨秦嬴起源于西戎的问题。

秦始皇东巡连云港地区，一是为了视察大秦帝国辽阔的疆土；二是为了看一看祖先曾经居住的东方土地。因此才有两次接见徐福。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徐福出海九年后，一无所获，仍然受到秦始皇的接见，并准其奏请，增派船员、物资，再次出海。

徐福是东夷后裔

秦始皇之所以如此信任徐福，与徐福为东夷后裔，甚至与秦始皇为同族有很大关系。徐姓，嬴姓，少昊之后。准确地讲，“徐”不是姓，而是嬴氏的分支。众所周知，秦始皇也为嬴姓。徐氏族姓是鲁南殷人六族之一。《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据甲骨文，商代已形成方国。周初，徐国日益强盛。《左氏春秋》：“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将徐国同三苗、观、姚、有扈提并论，说明徐国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方国。

据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先生考证，周代初年，



徐国在今山东曲阜附近,到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徐国败于周,南迁到数百里之外的淮水之滨。也就是今天的鲁南、苏皖北部的徐淮地区。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徐夷考》中亦云:“徐夷居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州一带。”徐州之名,即得源于徐国,是无异议的。徐福故里在赣榆区,史料确切,论证有据,是否定不了的。

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徐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徐福东渡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此时距徐福东渡约有一百年。汉代的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也同样记载了徐福带童男童女坐楼船去“三神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故事。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把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起来的是五代后周时,开元寺和尚义楚根据日本人口述记入《义楚六帖》:“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

徐福东渡精神在赣榆的传承与发扬

众所周知,徐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和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拓者。徐福东渡精神可以概括为:“开明、开放、开阔、开拓”。作为徐福的故里——赣榆,东夷起源之地,英雄大禹出生之地,如何发扬徐福东渡精神,在赣榆发展的历史上写下辉煌篇章,是当前赣榆人需要回答的一个现实课题。

秦汉文化景观应成为赣榆城市文化的最大特色。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赣榆城市临海处恢复重建“李斯碑”。李斯碑相传为秦始皇东巡秦山岛时所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赣榆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去海一百五十步,碑高一丈,厚一尺三寸,镌刻十二字。”据县志记载:“字大如斗,世称斗籀,为李斯所写。”目前,李斯碑已不见踪影,据老渔民回忆,这座石碑抗战前潮落还可以看见,后修环岛公路,可能被埋入路基。如此重要的文物,首先应进行挖掘寻找,即使寻找无果,也应根据有关资料恢复重建,重建地点最好在赣榆区城市临海处,因为建设在秦山岛难以扩大其影响力。二是围绕已经建成的海滨大道,加快打造秦汉文化城市景观带。要突出秦汉特色,建设好每一幢高楼,设计好每一个公共设施,使大道两侧展现出赣榆滨海

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打造秦汉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富有特色的城市。

徐福文化资源应成为赣榆旅游发展的最大宝库。要将赣榆的山海风光与徐福文化旅游有机融合,大力拓展秦山岛海洋文化游、徐福泊船山风情文化游、徐福古镇文化游,打造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继续举办“徐福节”等大型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在民俗风情展示、旅游产品开发、宗教仪式再现等方面多下功夫,从而为游客提供具有山海风情的旅游度假平台。

“东方药谷”应成为赣榆工业发展的最大亮点。目前,医药产业是连云港市最具竞争力、创新力的主导产业,省委、省政府也明确要支持我市新医药



赣榆区金山镇徐福庙

产业的发展。据调查,2016年恒瑞、豪森、天晴均进入全国医药工业前30强,康缘位列全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第55位,利税分别位居全市第2、4、5、9位。但赣榆在医药产业方面还没有取得长足发展。徐福东渡取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的故里应该成为“中国医药城”。因此,面对差距,迫切需要优化布局,加快建成创新医药基地,倾全力打响“徐福故里、东方药谷”这个最能代表我市工业的名片。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委研究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桥头堡”之争

薛广东

在连云港老街历史文化馆门前广场上,摆放着一座砂石雕塑,它的上方是一只铁锚造型,下方是两条铁轨造型,寓意着海上运输与铁路运输在此交汇、联结,即海铁联运。

这座雕塑建于1993年,它曾经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标志,安放在连云港的集装箱码头上。由于意义特殊,在连云港港口,它非常吸引人们的目光,来连云港港口参观、考察的人都喜欢在它面前驻足、合影留念。可惜的是,一起意外事故,让这座雕塑受到了损毁。一座造型和它一样的锡青铜铸造的雕塑,在原有位置上替代了它。2013年10月25日,连云港港口历史博物馆开馆揭牌,这座雕塑被安放到了博物馆的门前,后因连云港老街建设需要,移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岁月沧桑,虽然它现在离开了码头,但它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第一座标志性雕塑,仍然深深地铭刻在连云港港口人的记忆里。因为它蕴含了连云港如何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一段历史往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建设兰新铁路西段(即北疆铁路)接通苏联,在亚欧两大洲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大陆桥的构想,这一富有远见的构想,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85年,经国家批准,兰新铁路西段正式开始兴建。兰新铁路西段的建设,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多方面的关注。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条

铁路即将形成的东方桥头堡在哪里?

1984年,连云港成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连云港的发展在新时期第一次被摆上了国家战略层面。那时,连云港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了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上了,当地的专家、学者与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合作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撰写出版了《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方略》《亚欧新海大陆桥研究》《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新亚欧大陆桥与苏北的振兴》等多部专著,并且创办了我国第一份研究新亚欧大陆桥的期刊《大陆桥经济》。特别是时任连云港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罗栋生,提出了陆桥理论研究中著名的“三个经济时代”:江河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时代、陆桥经济时代;“三大”:大港、大市、大陆桥等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陆桥理论研究的基础。我市专家与铁道科学院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淑芬经过几年的辛勤研究,在《新海大陆桥运输的前期研究》《关于新海大陆桥东端桥头堡——连云港的探讨》等研究成果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启用大陆桥对我国和国际贸易运输十分有利;第二,连云港是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1990年5月,国家计委“大陆桥集装箱运输试运和研究工作小组”成立后,肯定了这个研究成果,并明确指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就是连云港。

1990年9月12日,我国的兰新铁路西段与苏联的土西铁路,在中苏边境的新疆阿拉山口站和苏



联德鲁日巴站之间接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铁路接轨剪彩,举世瞩目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宣告全线贯通。新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全长 10900 公里,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 7 个国家。其中在中国境内长为 4131 公里,沿线涉及江苏、山东、山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10 个省区。连云港作为陇海铁路的终端和陇海兰新铁路最便捷的出海口,理所当然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况且国家计委对此也予以了明确。这本不该有什么可争的,可在当时,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况并非如我们连云港人想象的那样美好。

在国内外对新亚欧大陆桥贯通的高度关注下,哪个城市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哪个城市必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一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二是可以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即使国家计委明确了连云港的东方桥头堡地位,即使当时的连云港港务局在新亚欧大陆桥还没贯通之时,就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宣传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了,但仍有一些港口城市对此虎视眈眈,要与连云港争夺桥头堡地位。

据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文件记载,在中苏铁路尚未接轨、新亚欧大陆桥尚未全线贯通之时,国内多个港口城市,就做好打“桥牌”的准备了,大家蜂拥而上,争着要做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连云港北边的一些港口,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修铁路、建码头,欲与连云港一争高下。连云港南边的某个港口城市,仗仗雄厚的经济实力,把出口商品周活动直接放到了荷兰鹿特丹举办,对这种有目的与鹿特丹拉近关系的做法,当地政府直言不讳地宣称:这是利用大陆桥运输,发展对欧贸易战略总措施中的组成部分。另外,该地政府又通过在黑龙江举行的中国对苏联和东欧经贸洽谈会,积极向欧洲各国开展贸易攻势。当时,争取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地位的工作,不仅连云港周边的港口城市在做,就是离连云港很远的港口城市也在做,就连那时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对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地位也颇有想法。当时

的《亚太经济时报》就曾在头版头条刊登过一篇《香港转口——又是一座大陆桥》的文章,在其所配发的附图中明确表示货物可以从香港经郑州、乌鲁木齐出境。很显然,香港也在争当“桥头堡”。

“桥头堡”三个字就像一顶熠熠闪光的金冠,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大家都想戴上这顶“金冠”。连云港知名学者张传藻先生曾围绕大陆桥写过多篇文章。他在《大陆桥即将开通,连云港应有作为》一文中指出:“欧亚大陆桥建成指日可待,连云港要成为桥头堡应该积极争取。”

那么面对其他港口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连云港该如何争取?

当时的连云港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1990年3月至4月,市政府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专门研究此事。1990年4月25日,在市政府召开的第三次争取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座谈会上,市政府主要领导明确指出:新亚欧大陆桥的形成,是连云港市继开放之后又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面对东方桥头堡地位引起激烈的竞争,市政府要求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把争取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实、抓好,并立即向省政府提交报告,阐述争取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激烈竞争形势,请求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书面报告,同时以省政府名义组织有关活动,支持连云港的争取工作,并委派一名副市长前往南京当面向省领导作专题汇报。当天的会上确定了几项工作措施,其中有一项就是成立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争取工作领导小组,时任市长的王稳卿任组长,副市长程智培任副组长,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专人脱产办公,专门负责大陆桥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拟定工作计划、安排有关活动、搜集资料、反馈信息和组织研究、论证等工作。用那时市领导的话说,争取桥头堡地位已是摆在市政府面前“一个紧迫的重要问题”了。副市长程智培在《关于争取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几点想法》一文中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例,认为连云港一旦成为东桥头堡,可大大加快连云港港城一体化步伐,必将带动连云港以及内陆腹地乃至江苏经济的发展。



此后不久,连云港市政府向江苏省政府提交了报告,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副省长高德正、季允石都作了重要批示。1990年5月22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争取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工作,时任连云港市委书记秦兆桢、副市长程智培在会上作了情况说明和工作汇报。省政府决定组织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负责此事,同时要求对连云港的港口建设、远洋运输、铁路改造等提出一个初步规划。省政府确定了六项具体工作计划:一是由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书面报告,明确提出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请求;二是以省长陈焕友的名义给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铁道部部长李生茂、交通部部长钱永昌、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写信,争取他们的支持;三是省政府各有关部门派员配合连云港市政府到北京开展活动,并在省驻京办以省政府名义邀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和学术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同时广泛进行宣传;四是由省政府正式发函邀请国家计委将“新亚欧大陆桥及港口、铁路调研考察会”安排在连云港召开;五是以省政府名义与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发起,在连云港召开“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六是江苏省与连云港市共同组团参加在阿拉山口举行的大陆桥接轨仪式,并举办连云港口岸信息发布会。省经贸委配合连云港市,争取在大陆桥接轨期间安排一列火车运载出口货物从连云港出发,通过阿拉山口。

可以说,江苏省政府的工作措施非常扎实有力,为连云港争取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国家层面并没有正式宣布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但通过省政府、市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在新亚欧大陆桥贯通之后,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新亚欧大陆桥贯通之后,连云港又在与天津、上海等大港竞争中胜出,于1992年12月1日,在新亚欧大陆桥上开通了首列国际集装箱过境专列,宣告新亚欧大陆桥正式投入运营。

1993年,连云港开港60周年,当时的连云港港务局建了这座桥头堡标志雕塑,并将其安放到了

集装箱码头上。1994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连云港视察,看到这座雕塑后非常高兴,他扬起右手,连声说:“新亚欧大陆桥起点就在这里!”他还为这座雕塑亲笔题诗:“巍巍天山皑皑雪,漫漫古道滚滚沙,一桥如虹贯欧亚,丝绸之路绽新花。”

在此之后,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之争虽然没有完全平息,但竞争却不再像当初那样激烈了,一些港口城市在对外宣传上,只能说新亚欧大陆桥是一桥双堡或者一桥多堡,他们是桥头堡之一。2009年6月10日下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新亚欧大陆桥又称第二亚欧大陆桥,从中国东海岸的连云港到欧洲西海岸的荷兰鹿特丹;并认为: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江苏沿海地区与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以及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为本区域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新机遇。这更加明确了连云港的桥头堡的地位。

2015年2月,连云港至塔什干、阿拉木图等城市的中亚班列开通,同年11月,连云港又开通中欧班列。自1992年12月开通过境班列至今,连云港已累计完成过境集装箱运量90多万标箱,遥遥领先国内其他港口,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对大陆桥沿线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尽管国内还有某些港口城市对外宣称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港口城市都无法撼动连云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地位。当然,通过桥头堡竞争,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要进一步加快、加强连云港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连云港在未来发展的多方面竞争中拥有更足的底气、更强的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作者单位: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沈云沛与云雾茶

蔡立志

沈云沛,近代连云港历史上著名的乡贤、实业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多有建树。沈云沛对家乡的云雾茶情有独钟,他历尽艰辛,使云雾茶量产,为云台山云雾茶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雾茶历史追踪

沈云沛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文化之熏陶。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赔款十亿两千万两之巨,丧失国土面积有 100 多个台湾之大,国格人格严重丧失,这是士绅及国人的巨大耻辱。沈云沛认为解救的办法就是“谋实业以增天下之元气”,以实业救国。

沈云沛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他经历了十年游学过程,考察了大半个中国,结识了张之洞等高官,还与董才卿、黄道传、朱璐、赵理斋等亲朋好友踏遍海州的山山水水,寻找开发项目,效法张之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欲将古今中外凡适合在海州境内发展的经济项目统统加以开发引进。先后举办了鸿门果木试验场、海州种植试验场、锦屏山博利树艺公司、云台山茶叶树艺公司、硝皮厂、临洪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等,沈云沛成为当时中国“商界之嚆矢”,走在了全国实业救国的最前列。

在兴办诸多实业中,他对云台山云雾茶的生产别有情怀。他知道,云雾茶是海州云台山的特产,在宋代即为贡品,如加以发展,定能大获成功。《宋史·食货志》中记载:“海州之利,以盐茶为大端。”“天下

之茶分为六榷,海州居其一。”“茶善而易售”,上交朝廷的“入钱之数厚于他州”。《云台新志》在记载这一段史实时有“细屡精采云雾茶,经营唯贡帝王家”的描述。直至清初禁海 23 年,使云雾茶日渐衰败。至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时称:“茶出云台山,形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

沈云沛坚定了发展云雾茶的信念,并付之行动。

沈云沛创造名牌

沈云沛弄清了云台山是生产云雾茶绝佳地址以后,便决心在云台山恢复发展云雾茶生产,并要生产出具有贡茶品质的茶中名品。

机缘巧合,时在海州的宋治基亦有开发云台山的打算。宋治基是花费 499 两白银而捐纳的苏州籍候补道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来海州办理民间义赈,他得知沈云沛筹办海赣垦牧公司,并有开发云台山之意后,遂与海州知州刘运吉商讨,利用海赣垦牧公司的便利条件,共同创办云台山树艺公司。刘运吉对此极力支持,便约请沈云沛与宋治基会见,共商成立云台山树艺公司事宜,双方一拍即合,遂拟定集资 30 万元筹办,按律制定《章程》与《开垦云台山地段图说》等各项工作,并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申禀成立云台山树艺公司。刘坤一接此申禀呈文后随即批准“该员(宋治基)等承办树艺公司,开垦云台山官荒旷土”,并对相关事宜作出批



示：“飭据署理海州知州章邦直，查勘明确，绘图贴说，稟复前来”。据此，宋治基与沈云沛遂集资 10 万元先行筹办，由沈云沛“仿照外洋开荒之法”制定《督率农工开垦种植条例》，明确提出“农工开垦”，“振兴商务，劈开地利，共谋天然之利”。所制定的《开垦种植条例》与海赣垦牧公司章程的不同之处，在于树艺公司确定引进外资与技术，坚持对外开放，“讲求种植，以兴地利”，效法西方的种植经验，以机器从事生产，引进技术人员，引进优良品种，引进先进技术。并着手修葺金牛顶的海曙楼，作为树艺公司的办公用房，时称北大局。此时，沈云沛举办的海州团练解散，赴京任职，树艺公司总经理由宋治基担任。

云台山树艺公司所筹集的 10 万元筹办资金，大部分由沈云沛认缴。根据资金短缺情况，沈云沛决定后云台山滞后开发，并确定树艺公司以种植云雾茶为主，“云台山势盘回迂曲，斜坡平地，面面向阳，土性膏腴，星分奎娄，气蒸云雾”。设凤凰岗、望海楼、凤凰坡、唐王洞四个管理局，统管 68 处开发地；计划在南云台山种植云雾茶树 800 万丛，并广种杉木、油茶等各种经济树木 1400 万株。公司开办 3 年后，进入最为复杂繁琐的迎接收获阶段，不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使之周转应急，调整组织结构。但由于资金短缺，管理混乱，宋治基束手无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宋治基以树艺公司名义，再以公司倡议人总经理的署名筹股，在上海盆汤巷丝业会馆、苏州阊门余元钱庄、南京宝善源钱庄等设 8 处股金代收之所，设售股点，却无人问津。非但没能如愿，反而招来原股民的怨愤，呼吁撤换宋治基总经理职务。在此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宋治基不知所踪。此时沈云沛从大局出发，为了使云台树艺公司继续运转，在总经理缺位的情况下，决定由董才卿具体经营运作，兴办茶厂，聘请高手精心制作云雾茶。所产茶叶以其“茶叶尖嫩，色浓味厚”的优良品质畅销国内外。沈云沛将之再次作为贡茶，呈献给国家顶层贵族享用，并于民国 4 年（1915 年），将云雾茶送到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览，一举获得金奖。云台树艺公司变得红红火火。民国 5 年宋治基

见此情况再度现身，并声明本人无力管理运作树艺公司这样大企业，愿将其股本折让退出。

宋治基退出云台树艺公司后，沈云沛便以个人名义向社会续招新股。在很短时间内筹集新股 15 万元，并将云台树艺公司更名为云台茶叶树艺公司，由董才卿主管经营。从此，云台茶叶树艺公司走上了正轨，进入了辉煌时期。沈云沛在作《清封中议大夫董君才卿七十寿序》中，叙述了董才卿在成立树艺公司中开辟交通、植林木百万等业绩，称：“凡此诸端，创始于余，而卒底于成者，皆君主持之，坚信之笃，数十年如一日之所致……”

沈云沛开办云台茶叶树艺公司，开中国荒山垦殖之先河，成绩斐然，使云台山云雾茶成为全国茶叶首获国际金奖的品牌，受到当时朝野赞许。绿意盎然，一批与之配套的道路、茶庄、作坊等涌现于昔日荒山沟壑之间，使荒山面貌大为改观，地方经济得以发展，官民收益良多，晚清民初史料多有记载。

云台茶叶树艺公司的云雾茶在沈云沛去世后的民国 13 年（1924 年）又获南洋劝业会奖。云台茶叶树艺公司，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筹办至民国 18 年（1929 年）宣告破产，30 年间，由欣欣向荣造福社会的辉煌历史，到民国 18 年大村扁担会农民革命运动使 800 万丛云雾茶树、1400 万株经济树木一炬成灰而告终。

云台茶叶树艺公司使云雾茶这一贡品再次兴盛，虽然沈云沛死后云雾茶再度衰败，至民国 20 年（1931 年）只能“岁可一二斤，山僧秘之”，但也为云雾茶后世的三度振兴作出了表率作用。

云雾茶三度振兴

云台茶叶树艺公司宣告破产了，但云台山的云雾茶仍在宿城以固有的形式延续着，云雾茶的名声仍留存在社会上。1958 年春天，江苏省兴办全省茶叶评比会。市农林水利局便派人到宿城乡大竹园石佃波家搜集到二斤春茶送展。令人惊喜的是，就这二斤茶叶成全了云雾茶与苏州碧螺春、南京雨花茶为“江苏三大名茶”的美名。

大竹园云雾茶为何能获得如此美名呢？因为大竹园一直保存有清代禁海遗留下的 300 多年古老



的小面积茶园。这一小块茶园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是年代长,保持了原有小叶种茶的特性,每斤茶叶的叶片数均保持在4万头以上,最高的可达4.8万头,这在全省是唯一的;其二,大竹园村,直到目前仍然是江苏省内海拔最高的山村,具备了高山出名茶的地势条件;其三,宿城为一封闭山区,地处沿海,云雾缭绕,为云雾茶的生长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其四,这块古茶园一直为石家所经营,在制茶工艺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如此一来,获此殊荣也在情理之中。其后人石佃彩仍为市云雾茶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

此次获奖得到市领导和市农林、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于1958年决定在原沈云沛创办的树艺公司大崗种植场创办花果山林校,并开展茶叶引种试验。1965年市林业主管部门为了促进茶叶生产,在花果山林校被解散后,成立花果山茶作试验场。市林业部门除支持花果山茶叶发展,对宿城茶叶也相当重视,于1979年将茶叶技术员龚永明派到宿城公社去驻点,促进茶叶生产,并聘请苏南茶师到宿城开办培训班,全市培训了7个炒茶手,其中宿城3个(石秀珍、翟新秀、郑沿南),云山1人,花果山2人,中云1人。并制定了云雾茶制茶的12道工序流程,使连云港市云雾茶的质量得到了稳定提高。1980年江苏省再次举办全省茶叶评比会,宿城云雾茶再次代表连云港市云雾茶参评,与碧螺春、雨花茶及阳慕茶一道又获“江苏四大名茶”称号。江苏省茶叶权威,省农林厅茶叶处副处长张定对云雾茶给出32字评语:“条索紧圆,形似眉状,锋苗挺秀,润绿显毫,香高持久,滋味鲜浓,汤色清明,叶底均匀。”直至今在云雾茶销售包装上仍沿用这32字评语。

20世纪70年代,是连云港市茶叶生产全面发展时期,花果山园林管理处,地处原沈云沛兴办的云台茶叶树艺公司的茶叶生产地段,因此发展较快,很快成了连云港市茶叶生产的主要产区。此时的赣榆县发展势头更大,从1972年开始,在金山、夹山、吴山、厉庄、石桥等山区大力发展,到1977年全县发展茶场56个,面积5600亩。1978、1979两年冻害,使原有茶园冻死一多半,仅有2000亩。

1983年后,全市茶叶生产再呈全面发展之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获得了更大的生产自主权,由于茶叶生产是一项用地省、效益高,加之有云雾茶为江苏省四大名茶之一的名号,所以赣榆夹山、金山、灌云大伊山,东海羽山,南云台林场,云台山中的云山乡、高公岛乡都纷纷发展茶叶生产。至1985年全市茶叶种植总面积发展到7667亩,总产30.1吨。

1985年后,连云港市的茶叶生产更是取得长足的发展。花果山风景名胜区,宿城乡这些老茶区阔步前进,其产品多次以云雾茶名牌参加国家及省级茶叶评比,多次获得好成绩。各林场也迅速发展茶叶生产,南云台林场、墟沟林场、中云林场、朝阳林场、大伊山林场都大力发展。

南云台林场云雾茶生产在沈云沛云台茶叶树艺公司的基础上迅速成为全市各林场茶叶生产的领头雁。各乡镇也大力发展,宿城乡继续领先,云台乡后来居上。2002年南云台林场获全国绿茶评比银奖。云山、高公岛、夹山、金山等乡镇大力发展,这其中以赣榆来势最为凶猛,后发先至,成为全市最大的茶区。到2016年,全市茶叶总面积为31705亩,总产475.8吨,平均单产15.02公斤/亩,较1985年的单产11.32公斤/亩,提高了32.6%。

如今的云雾茶是连云港市的一张名片,是连云港市代表性的旅游产品。2007年12月28日市政府将云雾茶的制作技艺列为第一批市级非遗项目,2009年6月24日省政府又将之列入全省第二批省级非遗项目。席行弟于2014年2月25日被省文化厅确定为省级云雾茶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张孟江、石佃彩于2010年3月29日被市文广新局确定为非遗项目传承人。

今天的努力,使连云港乡贤沈云沛复兴云台山云雾贡茶的夙愿得以实现。这是我们今日连云港人的战果,也是我们连云港人的骄傲。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永恒的纪念

——追忆我市赣榆区海头镇李巷村梁氏家族 6 位烈士

梁启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单位乃至普通的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节日，以怀念、纪念成千上万的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同时，表达人们不忘初心，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强国而奋斗之情。此时此刻，我不禁追忆起我市赣榆区海头镇李巷村曾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家父梁作富等梁氏家族 6 位烈士。他们有的献身于抗日烽火的战场，有的血洒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有的牺牲于浙江沿海剿匪战斗中，有的将生命的最后一刻献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们的英勇事迹时常激励着我追忆那一段段红色历史，时常激起我产生对他们怀念的情感，并在我心里形成了对他们的永恒纪念的印记。我以他们的英勇事迹而感到荣光和骄傲。

身经百战的梁作富

家父梁作富，生于 1926 年，听亲人们说，他身高 1.8 米有余，白肤圆脸，长得很帅气，曾旁听私塾几年。从小，比较聪明、好学。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是家乡沿海村庄有名的“歌手”，可能因受我爷爷会“唱歌”而影响，当时的乡亲们称他为“小歌手”。到部队后，他是 186 团的文艺骨干，经常参与文艺演出和指挥歌咏比赛。1945 年，他参加本村民兵组织，为保卫村民安全，每天坚持站岗放哨，经常帮村地下党支部读文件，受到了村党支部的关注和

培养。他于 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村里早期入党的一名积极分子。

1947 年，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关键时刻，党号召解放区广大有志青年、民兵积极参军。此时，梁作富刚结婚不久，且妻子已有身孕，但他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在父母及妻子的支持下，主动报名参军入伍，身披大红花，道别了家人，道别了乡亲，走向革命的军营。从此，由一名骨干民兵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他参军的欢送场面，一度成为远近村民谈论的一段佳话。

梁作富入伍后，先在山东莒南新兵连集训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的射击技能在几个新兵连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每次新兵连集训开会前的“拉歌”比赛时，都是他担任指挥。在集训期间，他还被选为党支部宣传委员，担任新兵连班长，深得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妻子、母亲专门为他做了几双布鞋，叫他二弟亲自送去。他只留一双给自己，其余的，均分给了同班战友。结束集训后，他和他的叔叔梁培佐及堂叔梁培年一同分在由许世友担任司令员的山东兵团第五师（后改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到了正规部队后，他仍然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并同时担任机枪班班长。

随后，梁作富随部队开始转战鲁中、山东半岛一带与国民党军作战。在攻打济南战役中，他所在部队主要是驻防济南城西南方向，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援敌和从城中逃跑的敌军。经过八天的血战，在



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等人指挥下，我华东野战军终于攻克了济南城，全歼守敌 10.4 万人，生擒敌军总指挥王耀武。在这次战役中，他因作战勇敢，英勇杀敌，荣获三等功，将立功喜报寄于家中，家人及乡亲们为之欣喜、庆贺。

济南解放后，梁作富又随作战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他所在部队仍然隶属于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参加了包围国民党军杜聿明部，几经多次激战，双方都付出一定伤亡代价。但，我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杜聿明被活捉。在此次战役中，梁作富、梁培佐、梁培年均荣立三等功一次。梁作富妻子于 1947 年底产下一个男孩，家里写信告之，当时他正在前线作战，待战斗胜利后，他得信后非常高兴。当时部队连长、同志们都说，梁班长双喜临门，一是打了胜仗，立了功；二是喜得贵子。他利用作息时间为家人写信道喜，并附上立功奖状一张，还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和平”。

淮海战役结束后，梁作富又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即由谭震林、王建安谭启龙指挥的二十一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作战中，梁作富所在部队遇到国民党军增援江防部抵抗，他奉命带领 2 个机枪班，向敌军发起反攻，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的道路。为此，他不仅再次荣获三等功，还被任命代理副排长职务。

在参加后渡江作战后，梁作富还参加了解放上海、杭州、舟山群岛等战役，同样表现出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参加解放舟山群岛战役后，他所在部队又参加了对沿海国民党军残匪的清剿任务。在一次剿匪中，梁作富率兵对敌人包剿，不幸被残匪偷袭，中弹牺牲，年仅二十四岁。他所在部队 186 团为他和其他烈士举行了隆重葬礼，将其遗体安葬于浙江台州海门镇（现在是台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南凤凰山下，现在此地叫台州市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就这样，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青春、甘洒热血，献出生命的一位英烈梁作富长眠于此。对此，家人、后人为其骄傲，为其怀念，为其纪念，直至今日，乃至永远。

为抗战而献身的无名“英雄”梁培槐

在 6 位梁氏英雄中，有一位是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他就是梁培槐。梁培槐，生于 1909 年，

从小家境贫寒，但胸怀志向。青年时代，毅然弃农从戎，投身于抗日名将杨虎城在山东一部，经目测，合格被编入正规军。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军官是共产党员，是一支纪律比较严明，爱护百姓，有正义感的部队。梁培槐随部队在山东打的第一仗，就是围剿罪大恶极的恶霸一方的“刘黑七”匪部，以为老百姓解除心头大患。对此，也有不少青壮年农民踊跃加入这支部队。之后，他还随部队转战河北保定、山西、陕西一带，多次与日军作战。后来，据本村同族、时任唐山县长的梁传舜转告他人说：梁培槐在战斗中，打日本兵时非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于 1941 年在对日军一次作战中，与战友同日军多次搏杀，最终全部献身于抗日战场。但因情况特殊，可惜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尽管如此，他的亲人、后人都感到荣耀。在他们心里，梁培槐是个真正的“抗日英烈”，是一个抗日“无名”英雄。

血洒淮海战场的梁家“三英烈”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场上，梁家有 7 位同志参加了历时 65 天的战斗，在“梁氏 6 英烈”中，有 3 位是血洒淮海战场的，那就是：梁培响、梁培信、梁作梅。

梁培响，男，1926 年生，194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任华东野战军滨海三团战士。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一阶段，梁培响随部队在山东临沂一带与国民党军作战，在部队遇阻时，他冒着敌军的炮火，勇敢地抱着炸药包冲上敌堡，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年仅 22 岁。

梁培信，男，1928 年生，1947 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时隶属于山东军区第二纵队，任战士。在淮海战役打响后，他随部队攻打碾庄黄百韬兵团时，英勇杀敌，冲锋在前，不幸被国民党军突围部队打中，壮烈牺牲，年仅 20 岁。

梁作梅，男，1927 年生，194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隶属于华东野战军一名战士。在淮海战役中，被编入战斗突击队，在战斗中，他主动勇敢杀敌，不幸被国民党军击中受伤。伤后曾在家养伤，在伤情好转后，又随部队参加攻打徐州城的战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 19 岁。



在抗美援朝中献身于异国的梁启早

在“梁氏 6 英烈”中，有一位将生命献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就是梁启早。

梁启早，男，1926 年生，1947 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隶属于华东野战军第二十六军二二六团一营战士。他参军后，分别投入解放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的战斗中，立过战功，并在战斗火线上入党。上海解放后，他随部队坚守上海、参加保卫上海的驻防任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梁启早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他所在部队驻朝鲜东线。1950 年 12 月，在东线咸南地区，与美国军队作战，在零下 30 多度的寒冬与美军、南朝鲜军作战，当时他双脚冻伤，被美军活活捅死。他壮烈牺牲时，年仅 24 岁。梁启早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抗击美国侵略者，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将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献于异国他乡。其妻在他入伍前与他成婚，并怀孕数月，1947 年下半年，生下一男孩。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工作，如今已退休，安享晚年。梁启早的妻子在他牺牲后，历尽千辛万苦持家，守寡一生，前几年去世，但最终未能与亲人（丈夫）合葬一起，成为憾事。

除了上述 6 位梁氏家族亲人参加革命，为国为革命捐躯外，梁氏家族还有梁培奎、梁培佐、梁培年 3 兄弟在解放战争中参军入伍，同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梁培奎，1923 年 10 月出生，1945 年 1 月参加村民兵组织并兼任民兵队长，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7 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任滨海军分区特务营副排长，后任排长，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的战斗。1948 年曾荣立三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在渡江战斗中，荣获“渡江作战奖章”一枚。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后，先后任海头乡党委副书记，城东乡乡长、书记及赣榆县海产办公室副主任。1982 年离休，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梁培佐，1929 年生，1945 年入党，参加过村民兵组织，并参与村党组织（地下）建设，担任过八路军地下交通员。1947 年初，率领 20 多人组成的担架队，支援孟良崮战斗。同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 21 军 62

师 186 团警卫班班长。在部队，他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杭州等战斗。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荣获三等功 2 次，四等功 2 次。1950 年 6 月，在参加剿匪战斗中受伤，受到团通报表扬。1952 年复员到地方，谢绝上级安排他在县武装部、供销社工作，执意回村务农，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书记。荣获过“抗日军功章”一枚。梁培年，1922 年生，1947 年 7 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第三野战军七兵团 21 军 62 师，任师警卫班班长。曾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的战斗。在负伤后，于 1953 年退伍回村务农。值得一提的是，梁培槐、梁培佐是亲兄弟，梁作富是他们的亲侄子。

岁月流逝，先人逝矣。小小的李巷村，一个黄海之滨近三千人口的李巷村，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李巷村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成立了民兵组织，参加沿海民兵抗日联队，开展地下秘密传递情报工作，配合滨海军区八路军打击日寇。同时，还建立了以民兵为骨干的抗日担架队，远渡至黄河以北，抢救八路军伤员。在解放战争期间，又组织了几十人的担架队，参加孟良崮战役，为抢救伤员立功，获奖旗一面。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李巷村出现了众多的参军报国的男儿，有近 20 名青壮年光荣参军，走上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斗，有的英勇献身，有的光荣负伤，是该村的一大荣幸和骄傲。我为村庄诞生了这些英雄和男儿而深感欣慰、自豪和光荣。因为他们那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无限忠诚以及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时时激励着、鼓舞着我和后人。他们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影响全国的“大英雄”的事迹来，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烈士和一般的战士，但他们那种为了迎来新中国的最终到来，为了保卫新中国，敢于英勇杀敌、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光辉形象，将永远存放在我的心中。

我们应该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和功绩！

（作者梁启平，曾任连云港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党委书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抗战时期的 滨海根据地 军政大检阅

王晓华

1940年9、10月间,为总结八路军第115师入鲁以来的工作,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在天宝山地区的桃峪主持召开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罗荣桓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根据部队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桃峪会议后,以建设模范党军为目标的整军运动在全师逐步展开。

整军运动是在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发动的“摩擦”中进行的,持续近一年时间。除政治、文化学习外,正规化制度建设、条令执行、制式教练以及射击、投弹、刺杀、迫近作业等四大技术操练均纳入训练内容。

1941年6月28日,115师师部移驻滨海根据地临沭县蛟龙湾村一带。这是一个有三四百户的大村,地势平坦,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群众基础好。时临夏季,青纱帐已起,日伪的“扫荡”减少,环境比较稳定。陈光与罗荣桓商量后,决定利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契机,举行盛大军政大检阅活动,一是对节日以示庆祝,二是检阅一年来整军工作的实际成果。并特别强调,部队大阅兵将是此次系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115师司令部、政治部根据师首长指示,做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14周年活动的决定。要求靠近师部的教导2旅、教导5旅每个团各抽调一个建制营参加,师直机关、特务营、教导大队、通信营都要参加阅兵式。这个决定发出后,立即得到机关、部队官兵的热烈响应,各受命参阅的部队迅速展开积极的筹备和训练工作,部队掀起了新一轮整训高潮。

1941年8月1日拂晓,八路军第115师自改编以来最大规模的大阅兵在滨海根据地如期举行。



1941年8月1日,在滨海根据地蛟龙湾举行的八一军政大检阅

阅兵地点安排在蛟龙湾村庄西北角一个大广场上。检阅台由木棍和木板搭建而成，一人多高。阅兵台正面、侧面悬挂着长条红幅，格外醒目。早已闻讯而来的周边各村群众翘首以待，将整个阅兵场围得水泄不通。

各受阅部队在天刚亮时就已齐聚阅兵场。经阅兵指挥部调动，近四千名全副武装的指战员，以各营为成营方队，整齐划一，庄严肃穆，面向检阅台，排成凹字形受阅和讲话队形，准备接受师首长检阅。

检阅台上，站立着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有八路军第 115 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肖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山东参议会、战工会和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主任、代表李澄之等人。会议由肖华主持。

阅兵式前，全体指战员在庄严雄壮的八路军军歌的演奏声中，首先向建军 14 年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默哀致敬。随后，朱瑞、黎玉、李澄之等人先后致辞，最后由陈光代师长致辞。

7 时整，阅兵仪式正式开始。阅兵总指挥、115 师参谋长陈士榘跑步向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敬礼报告：“准备完毕，请首长检阅！”

陈光走下检阅台，跨上他那匹枣红马，在总指挥陈士榘的陪同下，开始对部队检阅。每走到一个方队前，威武雄壮的战士们立正向首长敬礼，行注目礼，陈光也举手向指战员们还礼，并亲切问候“同志们好！”指战员们整齐洪亮的回答“首长好！”声音气势如虹，声震天宇，展示了 115 师将士们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军事素质。

检阅完毕后，师首长和来宾又一同登上检阅台，罗荣桓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部队进行分列式表演。当嘹亮的军号响起时，受阅方阵官兵，肩扛刺刀闪亮的步枪，在各领队的带领下，依次进入阅兵场。表演方阵人人精神抖擞，军容整洁，动作雄壮整



八一军政大检阅中，八路军战士进行刺杀表演

齐，步伐铿锵有力。抵达阅兵台时，领队发出“向右看”的口令，刹那间，全体受阅指战员面向阅兵台，向首长行注目礼。每经过一个方阵，阅兵台上的首长们都会热烈鼓掌或挥手致意。围观的群众更是被这从未见过的宏伟场面所震撼，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和欢呼声。

阅兵式在庄严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前后历时两个多小时。

下午在各个场地又举行射击、刺杀、投弹、跨越障碍等诸多军事科目比赛。军事、政治、文化测验及各项体育比赛等活动亦同步进行。

阅兵式后，山东党政军民的首长和代表们又一同参观了“八一展览会”。

展览会馆设在蛟龙湾一胡姓大地主的院落中。大门右侧立柱上，刷着白底红字，“八一展览会”五个大字格外醒目；左右两侧的墙上，张贴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走进院中，一座由青砖砌成的七层大烟囱被改造成了纪念墙，每一层写一个巨大的红字，组成“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

展览室共有 10 个，风格迥异，特色鲜明。既有政治性、战斗性和创造性，又全面展示了 115 师自建军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光辉业绩，极具教育意义。



展室展品(左)和“八一展览室”大门(右)

给日军的宣传品、日本反战小说等材料也赫然陈列其间。第八、九展室是宣传展览室。运用诗配画的形式,精心绘制一幅“铁流两万五千里”宏篇巨

第一展室是军事教育训练展览室,陈列着上百种军事教材、教育图表、兵器模型。这个展室由时任115师司令部五科队列股股长周之同作向导解说。第二展室展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图表和材料,反映115师自建军以来参加的重要战役经过的历史。第三展室是供给展览室。陈列着部队自己生产染织的布匹、自制的鞋袜、服装、子弹、手榴弹等。第四展室是卫生展览室。墙上张贴着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画像。展板上陈列着解放区自制的30余种药品、棉纱、简易器械及图表说明。

三、四展室的展品,充分显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敌伪顽匪等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酷封锁下,发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精神,粉碎敌人阴谋,从困境求得发展壮大的巨大力量。

第五展室是学习展览室。这一展室内容,主要是展示前一时期,各部队干部战士学知识、学文化的重要成果。既有党员干部学习总结材料,也有普通战斗学认字、学写字的作业本。原教导大队李梓斌、教导2旅副旅长张仁初学习的情况也陈列其中。其他干部战士的政治、文化教材近千种。第六展室是民运工作展览室。多以图表和教材为主。第七展室是敌军工作展览室。在众多展室中,这个展室最具立体性、观赏性和创造性,令人耳目一新。在根据地艺术家的努力下,8座表现打入敌军内部工作的雕塑,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更为难得的是,原苏联军队打退日军进攻,在张鼓峰战斗中用飞机散发

作,画面气势恢宏,积极向上,是一部表现八路军14年来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斗争缩影。同时展出的还有十几件红军时期的文件、照片、歌曲以及11年间出版的《战士报》、图表、教材、木刻、绘画作品和剧本等。第十展室是战利品展览室。陈列着115师在平型关、梁山、陆房、白彦等重大战役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有迫击炮、九二步兵炮、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掷弹筒和各种兵器与军用品等。

参观结束后,对八路军115师14年来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主任李澄之表示出了由衷的钦佩和赞誉,在展室留言簿上,他写道:“在这个展览会中,表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伟大革命与创造的奇迹,有革命的意义。”

这次大检阅,时间持续近半个月。通过这次阅兵、军政比赛和测验,不仅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更重要的提高了干部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水平,大批干部成长起来,为进一步推动部队的整军热潮和强化部队军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滨海抗日根据地大检阅的画面,被军旅摄影家苏静和郝世保两位同志用手中的照相机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成为研究山东及滨海抗日根据地战史的珍贵资料。

(作者单位:东海县商务局)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寻访石湫古镇

韩世泳

在海州辖内有个古老的城镇——石湫镇。它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险要，元代之前它是海州的海防要地，全国闻名。早在民国20年（1931年）就入选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编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海州志中更是多有载述。

石湫古镇在何处

历史上的海州石湫镇在何处，有多大？

明代的《隆庆海州志》载：“石湫镇，在州东十里。”清代的《康熙海州志》说：“石湫镇，治东十里，废。”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说的更具体，它说“石湫镇，州东十里胸山下”。但没有说它“废”了，说明嘉庆年间又有了“石湫镇”。据我市历史文化专家张传藻考证：“海州城南的石湫堰”就在“今锦屏陶湾”（张传藻著《连云港地理与经济》）。根据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古石湫镇当初就在今海州区孔望山东海边一带。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古州志关于银山、九洪桥、石湫河等记述，就可以看出古石湫镇的地域范围绝不仅仅是孔望山东一带。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述“蔷薇河”时，引用清朝初年顾祖禹编撰的《方輿纪要》资料说：“石湫河在州南二十里。旧时，州境之水多汇于此，以达海。”在记述“九洪桥”时也说，九洪桥“在石湫镇，去州南二十里”。特别是《万历淮安府志》在记述新坝镇和石湫镇时说，“新坝镇，去治南四十里。”“石湫镇，去治南二十里。”说明石湫镇是在海州城与新坝镇中间。而海州城南

胸山（锦屏山）以北一带是西门镇。由此可知，胸山以南一直到新坝镇北界之间及胸山、孔望山东一带，都是石湫镇属地。

胸山以南的新坝镇和石湫镇的分界线在哪里？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刊“海州合属全图”和“海州疆境图”中可以看出，两镇分界线就是沂沭之水所经入海河道——石湫河，即今天锦屏

镇的新海村、李圩村与桃花村、酒店村之间。锦屏镇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圩村人李金禹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家所在的李圩大队（今李圩村）北边，还有一道河床遗迹。河床遗迹从新海大队（今新海村）向东经哑巴山南拐向东北。当时河床遗迹宽约50~60米，河床深处还有水，小孩子们常下去抓小鱼玩。后来，河床全被开垦为农田了。再后



明代万历淮安府志关于石湫镇、新坝镇的记述



来,锦屏镇开挖的八一河,有一段还沿用了旧河床走向。现在大部分河床遗址都到了 204 国道身底。从李金禹介绍的情况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存的旧河床遗址,极可能就是古石湫河的遗迹,是当初的新坝、锦屏两镇的分界河。今天的李圩村、新海村大部分地区,当初还在新坝镇域内。

在宋、元、明及清代乾隆初期,孔望山、锦屏山(原称朐山)、银山(今刘志洲山、哑巴山)以东,还是汪洋大海。今日海州区经济开发区所在许庄、范庄一带,甚至是陶湾、狮树一带,都还未成陆。今范庄与其东北的南城之间,更是风急浪高、十分险恶的“小海”。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当初的石湫镇远没有新坝镇大。《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记海州“五十镇田粮册”,更能说明石湫镇比新坝镇小得多。“田粮册”载:新坝镇有“大粮田六十七顷七十九亩二分六厘五毫,芦苇小粮田三百八十顷九十八亩七分三厘”。而石湫镇有“大粮田八顷四十八亩二分六厘,芦苇小粮由二十七顷九十一亩五分一厘”。分别只相当于新坝镇的 12.5%和 7.3%。

当然,古代的“镇”,并非今天的一级基层行政区划的“镇”,直到明代依然如此。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刊印的《隆庆海州志》,保留有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州张峰所纂原稿中的“张氏论曰”的诸多评论。在《卷之一·舆图》之“集镇”目下,“张氏论曰”：“海州地广,而盗贼多窃伏草野,故聚数十家而为镇。其散在各村以便田事者,不过四五家,皆与镇为声援。镇设老人二人,以主勾摄游徼;大镇倍之。也古者闾胥党正之遗意也。择老成晓事者以充其役,而官制其纠戒之令,使不为害,则词讼可平,盗贼可息矣。”这说明古时的镇,就是在一个地区“聚数十家”人家,大家推选两位“老成晓事”的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区域性地名。石湫镇也不例外。

石湫古镇有多古

石湫镇建于何时,有多古?古州志中无具体记述。可是,我们从古海州志等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石湫镇的出现早于新坝镇。

《隆庆海州志》在记述“新坝”时说:“新坝,去治南四十里。旧有银山坝以捍海潮,则涟河之水由此入官河,以通安东支家河。今海堰既决,始于此筑坝,故名。”也就是说,先有“银山坝”,“银山坝”被毁了以后才有“新坝”。“银山坝”筑于何年,暂未见确切资料。但它毁于何时却有较明确的记述。《隆庆海州志》说:“银山坝,去治南二十里。自青州穆陵关发源,合沂沭水,由九洪桥入海。其势奔迅易涸,故筑坝以渚清流,为农田利,且隐然城守之险。宋元之际,赖以抗敌,常加修护。元季为张士诚所据,恃此防守。王宣父子欲侵海州,决堤堰以便步斗。从此遂废。”这说明,早在宋代(960—1279年)已有“银山坝”,它既是一项挡海潮、蓄淡水以利农业的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海防设施。到元朝末年,最迟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为王宣父子扒毁。旧的银山坝被毁后,即便在大明王朝一建立时就在海州城南四十里处又建一座新的坝,并因此而得名“新坝”,

新坝 去治南四十里。旧有银山坝以捍海潮,则涟河之水由此入官河,以通安东支家河。今海堰既决,始于此筑坝,故名。

银山坝 去州治南二十里。自青州穆陵关发源,合沂沭水,由九洪桥入海。其势奔迅易涸,故筑坝以渚清流,为农田利且隐然城守之险。宋、元之际,赖以抗敌,常加修护。元季为张士诚所据,恃此防守。王宣父子欲侵海州,决堤堰以便步斗,从此遂废。而州南鸭子荡数处,污下常涝,利于坝之不修,常轩轾其间;然较夫大利害,则是坝之修,利于官民居多。故详载之。

明代隆庆海州志关于新坝得名原因(上)、银山坝及其被毁的记述(下)



而后又因“新坝”而出现“新坝镇”之镇名。“新坝镇”最早也就出现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距今约650年。而《隆庆海州志》在记述“九洪桥”时说：“九洪桥，在石湫镇。宋建，石刻俱存。”这更说明，很可能在北宋年间已有石湫镇。而到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石湫镇已经成为宋王朝的东海重要海港，在宋金交战时，更成为金人攻夺海州的重要军事要地。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距今1000年前，海州已有石湫镇。到金大定二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石湫镇已成为海州东南路要镇。而其形成为镇，则可能更早些。

石湫古镇的区位优势

石湫镇之所以成为古海州的一个重要城镇，在宋代更成为宋金争夺之要地，这与石湫镇所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石湫镇位于海州治南二十里，离海州古城很近，往来方便。自来得海州古朴之风熏陶，古镇四周环境更是得天独厚：东临东海（今黄海），并有孔望山、朐山、银山（今称刘志洲山或哑巴山）作为海上天生的“大门”“关隘”，为东海沿岸的重要海港；西临蔷薇河，南有石湫河沟通古涟河、官河，是海州盐斤、粮草运输及农田灌溉的黄金水道。石湫河上游有宋天禧四年（1020年）建的石閼堰，下游入海处有石湫堰，并常年有兵勇戍守；北有秦始皇在此“立石以为秦东门”的朐山（锦屏山）为屏障，背风向阳，环境宜人。

也正因如此，在宋朝北方金人南下侵犯时，把海州作为进犯要地之一。而在攻打海州时，石湫镇又是进攻的战略要点。宋金交战时，在这里发生过多次争夺战。南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年），海州至涟水一带为金兵侵占。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南宋王朝派王胜率军攻打并收复海州。第二年，海州又被金人占领。就在这宋金两方争夺海州之际，宿迁人魏胜率抗金义军，一路胜利，打到海州，并于绍兴三十一年，即金大定元年（1161年）八月收复海州。金主又派乌锦太师领诸路兵马二十余万来攻海州，并先派出一支兵马到海州城西南，切

断魏胜大军粮饷之道。魏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精选勇悍士兵三千余骑，赶至石閼堰，迎击金兵，保全了粮饷之道。这石閼堰建于宋天禧四年（1020年），就在石湫镇之石湫河的上游。金兵不死心，又派十万大军来夺石閼堰。金兵来势汹汹，魏胜率众鏖战，杀金兵数千，量形势紧迫，即一边下令严守，不准出击，一边向上求援。在金兵围困海州最严峻时刻，李宝亲率水师赶来海州，于朐山南银山下海港登岸，奋力歼击金兵，金兵败退，魏胜出城迎接李宝，并犒劳李宝兵士。

《续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述：金大定二年（1162年），“金以数万众围海州，诏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往援，仍听张浚节制。浚为书子盖，令出骑乘敌弊。子盖整军渡江，去涟水至石湫堰。金万骑陈于河东。子盖曰：‘彼众我寡，利在速战，不可令敌知我虚实。’于是，率精锐数千骑，驰马先入。复州防御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战，御营宿卫前军统制张玘为流矢中其脑，没于阵，士卒死斗，金兵遂大败，拥于河溺死几半，余骑遁去。石湫，州镇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市考古工作者在刘志洲山山坡上发现的两组九艘战船岩画和“招信军”等石刻，以及在其附近采集到的大量宋、金年代瓷片、宋代的韩瓶（抗金英雄韩世忠部所用水瓶）、金代的铜镜等文物，也都印证了当初在这里发生的战斗史实。

石湫古镇的“石湫城”

初次了解时，听当地人说，这儿不仅有石湫镇，还有石湫城。事后，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虽然一些古州志中没有设“石湫城”这个条目作专门记述，但是在记述一些历史事件时，却记述了“石湫城”。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述“石湫堰”时写道，“（《方輿纪要》）州南二十里旧有石湫堰。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围海州，张子盖自镇江赴援，至楚州，先趋涟水，择便道以进，至石湫堰，击败敌兵，是也。今石湫镇东北九洪桥即旧堰水处。〔案〕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伐宋，博罗驩统左军攻海州、东海、石湫三城皆下之。是石湫为当日要地也。”这说明，在古石湫镇确



确实实有过一座石湫城。

当我们再次到锦屏镇酒店村去调查时,情况就更清楚了。当地东王庄王怀富(86岁)、倪茂才(81岁)等老人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四周还有4个“石门”。这4个石门分别是:“东石门”,在今东王庄东首;“西石门”,在西王庄原生产队仓库处;“南石门”,在张庄东首;“北石门”,在刘志洲山北、锦屏磷矿东山石油库处。南北长3~3.5千米、东西长1.5千米。整个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对家乡历史文化十分关心并注意做好资料搜集的村民王宝春(63岁)告诉我们说,他青年时不懂事,曾参与砸家边的“东石门”。也正因此,他对石门的形象、规模印象特深。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当初做法不对,便自觉地为保护家乡文化遗存多做点事。他根据亲眼所见和父亲的讲述,把石湫城4个石门的形状、规模,详细地记到本子上。在他家,他一边让我们看他那有图有文的记录本,一边向我们介绍说:“石湫城的4个石门,实际上就是两根石柱,石柱上边没有横石,下边有石砌的门槛。但是,石门都很雄伟,两根四方形石柱高约3米,每个柱顶上有石球。两根石柱之间距离,也在3米多。”据当地老人回忆,在东南西北4个“石门”内还另有城墙、城门。南城为3个门洞,中间门宽可走马车,两旁门稍窄,为行人通道。城门上还建有城楼。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墙、城门才被拆毁。

在倪茂才老人家,老人告诉我们,从前这城里东西石门之间还有一条宽约3~4米的小街。据老人说,这街两旁都是卖东西的小店、小摊,十分热闹。现在,这小街两边都盖成了住宅。他家这屋身底就是小街。

王宝春还介绍说,前些年他在哑巴山南山根帮他三叔淘井时,挖到两米深时就挖出很多木炭、牛粪,再往下挖到7~8米时,就尽是海沙淤,井就塌了。这说明在几百年前,银山曾在海边,石湫镇、石湫城为海滨城镇。后来,到清乾隆年间,随着大海远去,失去倚山傍海以及涟河经石湫河的出海口之优势,石湫城风光不再,渐成山村了。

石湫城围山傍海,地势险要,和海州城、南城

(凤凰城)一样,是海州乃至宋王朝的东大门、海防要地。在宋金交战期间,围绕争夺海州,双方多次在此交锋。

石湫城环境优美,城内银山上下,遍布庵寺十多座。现在当地老人能说出名字的有银山顶上的“金龙殿”、哑巴山西首有“回龙庵”、哑巴山东首有“天齐庙”。相传金龙殿是古时一个叫刘志洲的人占此山为王时所建。金龙殿庙宇占地约两亩。庙宇前还有东马路、南马路和前马路,可见当初规模之大。金龙殿早已毁坏,但墙框至今尚存一两米高,其墙全是一米多长大条石所砌,石缝皆以糯米汁拌石灰填灌,十分牢固。据当地人介绍,石湫城里还设有专门关押要犯的牢房和处决人犯的场地。小东山上还设有炮台。

石湫城,紧靠海州古城,有山有水,风光优美,交通方便,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一些大户还在此建造山庄供避暑防寒之用。清嘉庆年间,海州文人许乔林编印的《胸海诗存》中就收录海州人许芹所写的《石湫山庄》诗一首。诗曰:

重重石壁路回还,身在千岩万壑间。
石碣断埋荒草径,纸窗破补夕阳山。
篱编短竹防云锁,犬吠行人识主还。
却喜秋成官赋足,叩门无吏昼常关。

千章古木一草堂,崑里风光足徜徉。
落叶半空黄蝶坠,晴岚几叠翠屏张。
花开晚稻香浮水,日送奇峰影过墙。
遥听隔溪喧社鼓,村巫只解赛神忙。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座建在石湫城银山山坡上的庄园,有着十足的田园风光。若想登此山庄,必先劳其筋骨,绕过几重石壁,置身“千岩万壑间”;它没有石砌的花墙,只围着短竹编织的矮篱笆;它没有几出几进的院落,只是“千章古木一草堂”而已;这里没有名家赠送的字画,但其周围却有着一张张岚气缭绕群峰的天成翠屏;这里没有山珍海味,但是,这里有着人们着意追求的生活美景,喜得年景较好,收成丰实,税赋都已交足,没有吏卒上门叨扰。金秋季节,山下一片片晚



稻正抽穗扬花，飘送着令人陶醉的清香。村庄里不时传来锣鼓声，庄稼人已忙着庆丰收啦！

石湫古镇——今锦屏镇的前身

石湫镇和新坝镇、板浦镇、龙苴镇、牛山镇、白塔埠镇等都是海州古镇。可新坝、板浦、龙苴、牛山、白塔埠等古镇名，一直在沿用着，直至今日新修的《海州区志》《灌云县志》《东海县志》中仍有其名，而自宋已有的石湫镇，今天却不见其名了。原因何在呢？

石湫镇，既是一个古代地方性居民自我管理的机构名称，更是一个地域性的地名。它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所代指的地域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海州大地上的，是不会没有了的。那么，它所代指的这片地域，今在何处呢？

从古代地方志关于石湫镇的记述来看，这块地方就是今天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锦屏镇。也就是说，今天海州区的锦屏镇，其前身就是古海州的石湫镇。依据有三：其一，明代《万历淮安府志》说“石湫镇，去治南二十里”“新坝镇，去治南四十里”，说明石湫镇在海州治所海州城与新坝镇之间。今天的锦屏镇就在这个位置。其二，古石湫镇内有银山，山下是大海，南宋时，这里是抗金战场。今天的《连云港群山概览》《连云港市志》《海州区志》都记载刘志洲山（注：刘志洲山即古银山）下是海港，是南宋时抗金战场，至今山上还有南宋抗金岩画和石刻。其三，古石湫镇和今锦屏镇都西至蔷薇河，东到锦屏山东的一溜山根（今许庄村、范庄村是清代海退后成陆的）沿海地带，北至锦屏山（古称朐山），南与新坝镇接壤。其四，《朐阳纪略》之《地部》在记述“海州诸镇”时说“合州五十四镇……朐山南三镇：卸甲坊镇、石湫镇、新坝镇。”这三个镇的方位是：石湫镇在朐山东及正南，新坝镇在石湫镇正南，卸甲坊镇在石湫、新坝两镇西部、朐山西南部。如今，这三个古镇中，新坝镇（属海州区）依然存在，卸甲坊镇虽不是镇，地名也演变成了“卸房村”（属东海县张湾乡），但地域名称的沿用没有断线。唯石湫镇这个地名，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如今在古石湫镇的方位

上的就是海州区的锦屏镇。

那么，自宋代开始沿用了千余年的石湫镇这个古老地名，是什么时候变成了锦屏镇的呢？从现有资料看，这个变化很可能就发生在民国22年（1933年）。因为，在民国元年，国民政府撤销海州，改设东海县时，东海县国民政府沿袭清制，在全县设50个镇。同年4月份，东海、灌云分置后，东海辖39个镇。民国2年（1913年），东海县将39镇调整为9个区，大的称市、小的称乡。这时，石湫镇（属石峰市）依然存在。而到民国19年（1930年）东海县再次调整区划，全县设5个区，辖4镇53乡时，新坝乡依然存在，属第一区，而不再有石湫镇。这时，石湫镇很可能划入第一区的新坝乡了。而在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全面实施保甲制时，东海县国民政府在全县设5个区，共辖111个乡镇。乡镇数量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多，乡镇属地也相应变小了。于是，在锦屏山南、原石湫镇地区就与新坝乡、章湾乡（张湾乡）一道，进了东海县第一区所辖24个乡镇之中。而这时锦屏山名已使用了几百年，特别是山南麓的锦屏磷矿已成为东海县乃至江苏省的知名矿山企业。锦屏乡便成了在锦屏山与新坝镇之间新设立的乡的名字。成为东海县第一区所辖24个乡镇之一（《民国时期海属县市建置区划沿革暨档案文献选编》）。

从此，冠以“锦屏”的行政区划地名一直被沿用着。1948年11月初，新海连解放后，新海连特区就在新海市下设锦屏区。1952年7月，锦屏区改称海州区。海州区在锦屏山南设锦屏乡。后来，锦屏乡又改称锦屏公社。1984年，体制改革，撤销公社，复称锦屏镇至今。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灌南第一所小学的前世今生

耿中太 韩翠林

1911年，在古老的海西大地上诞生了灌南第一所小学——新安小学。100多年来，虽几经更名，仍沿革至今。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溯历史，仍然能感受到它传播、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历程。

第一所小学的“前世”，源于卫公书院、化成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最早的官办书院始于唐朝，最初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正式的教育制度则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但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新安镇第一所书院也是在此时期创办的。如果按其职能定位分，这一时期的书院有三类：其一是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是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其三是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书院的学员可以不受年龄、身份、资质、籍贯等限制，只要有求学愿望的均可入学。无论是官办还是私立，书院还对学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补助，并对学业优异者予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

清乾隆九年（1744年），海州知州卫哲治来新安镇救灾放赈时，捐资创办了卫公书院，这是灌南第一所具有官府资助性质的学校。院址在新安镇三排巷，即原县人武部大院所在地（现为上海商场），书院占地3000平方米，有学生50余人、教师10余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停办。卫公哲治，字我愚，号鉴泉，河南济源人，乾隆七年（1742年）任海州知州。在任期间，他勤政爱民，兴修水利，整治

六塘河堤堰，十分重视教育，在他创办卫公书院的同一年，乾隆皇帝曾御笔亲书“安民为本”四字匾额赐予他，可谓政声颇著，深得民望。

化成书院于清咸丰九年（1860年）由汪良才捐资在五排巷创办了化成书院，院址在新安镇五排巷，现位于县实验小学西侧，占地7000平方米，有教学用房20余间，学生100余人、教师20人，后改名为化成学堂。1903年迁至三元宫，改名新工学校。汪良才，曾任教谕、邳州学正的国子监典籍。学正为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明学正秩正九品。清初仍旧，乾隆初升为正八品。清州学官亦称学正，学正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配置于国子监，而从事业务则相当于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

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书院改设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和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清宣统三年初（1911年），新安镇设立新安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新莞市高等小学，这是新安镇设立公立小学的开端。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废除海州，设置灌云县，改新安镇为新莞市，隶属灌云县。校址至千佛寺，现位于教育局宿舍区一带。学校共有5个班，学生210人、教师7人。民国16年（1927年），学校迁至三排巷宣家大院内，即现在的新安镇幼儿园，更名为灌云县公立第三小学。当时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今灌南县境域北部属于灌云县第三区，区公所驻地新安镇。当时有8个班，学生320人、教师12人。民



国 18 年(1929 年),校址又迁回千佛寺,复称新莞市高等小学。民国 22 年(1933 年),更名为灌云县新安小学,共有 9 个班,学生 380 人、教师 16 人。民国 28 年(1939 年)3 月,日军侵占新安镇,学校被迫停课。民国 29 年(1940 年),校址迁至惠祠堂,位于石头路的原县委党校(现为锦绣花都住宅小区),恢复上课,共有 3 个班,学生 120 人。民国 35 年(1946 年)7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学校又遭破坏,被迫停课。

灌南第一所小学从诞生起,就多次易名、颠沛流离,但其正确的方向和育人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在民主革命时期,第一所学校的师生大多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新安学堂以“倡导民主、决裂封建”而著称于淮海大地。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前辈惠浴宇和同学武永嘉于 1928 年暑假,在惠祠堂举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教学主要内容揭露社会黑暗、宣传革命道理,遭到镇上反动势力的封杀。民众学校开办期间,涟水县的国民党党部宣传干部万金培(其另一身份为中共涟水县委负责人)闻讯来此,他听了惠浴宇的课,彼此进行了长谈,而且很投机,两人说到“济南惨案”都义愤填膺。万金培便介绍惠浴宇参加共产党,惠浴宇听后大为兴奋,立即表示同意。从此,惠浴宇走上革命道路。1928 年 7 月,惠浴宇参与建立灌南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新安镇特别支部。同年,参加成立海州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会议,任东海、赣榆、沭阳、灌云四县党的特别支部组织干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第一小

学的师生们积极配合党组织,奔走于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宣传“救亡图存”的思想,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所小学的“今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小学也迎来了新生。民国 36 年(1947 年)9 月,新安镇解放,新安小学又恢复上课。1949 年,学校共有 4 个班,学生 160 人、教师 7 人。1957 年 11 月,经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上报、国务院批准设置灌南县,县人民委员会治所新安镇。1958 年,学校正式更名为灌南县新安小学,校址迁至新安镇四排巷,位于新安路东,原新安派出所一带。共有 21 个班,学生 1020 人、教职工 34 人。1960 年,校址迁至新安镇镇北村,即现在的军民路 13 号。2008 年 10 月,县委、县政府决定,新安小学从新安镇建制下升格独立为教育局直属学校,从此学校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6 年,学校占地 136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361 平方米,拥有教师 78 人,学生 2500 余人,育人环境显著改善,教育教学质量位居全县前列。

百年沧桑,自强不息;百年求索,传播文明;百年耕耘,桃李芬芳。从这里走出的惠浴宇、周惠等灌南人民心中的杰出代表,国画教授王小古、亚运会自行车冠军李梅芳以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牺牲的周勤珍、耿玉宝等革命烈士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我们有理由相信,灌南第一所小学的明天依然会书香鼎盛、朝气蓬勃!

(作者单位: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官廉则威



清荷拒染

江苏省大港中专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剪纸艺术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廉政剪纸展、剪纸教师现场剪纸等形式,让师生在欣赏剪纸艺术的同时,思想上受到启发、心灵上得到洗涤。图为金皓、顾金光的剪纸作品



伏广喜

凤凰城，这座康熙五十年（1711年）还孤悬海上的名城，筑城时间为南朝元徽二年（474年），筑城人为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

刘善明（432—480），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少年时期以读书刻苦而闻名。他的父亲对他说，一个人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远大的志向。希望他将来用自己的才华效力于朝廷。刘善明40岁那年，也就是泰始七年（471年），得此时的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赏识，被任命为治中从事。元徽二年（474年），刘善明出任辅国将军、西海太守职位，并从刘崇智的任上接过青冀二州刺史一职。

此时的青冀二州已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大批难民逃到郁洲山（今云台山）地区。为管好这些难民，朝廷便在郁洲山侨置青冀二州。在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海州”一名诞生前，为该地区最高行政组织。青州当时领2郡，一为齐郡，二为北海郡。而冀州所领9郡均为虚置，没有实际地盘。此时的青冀二州，州治所为郁州山下的赣榆县。

刘善明到任后，“课民种榆、杂果，遂获其利”。在其任上，最大的政绩便是首筑凤凰城。当时的郁洲山，“在海中，周围300里，有鱼盐田畴之利”。他之所以选择在郁州山筑城，是因为想长期经营这片土地。他将城的具体位置放在郁州山最南端东西凤凰山之间。这里，西南控海，东北抵山，易守难攻，为难得的军事要地。因其雄峙于两座凤凰山脚下，故名凤凰城。凤凰城分东西两城，即“大城连小城”。全长6公里，高丈余，皆以石砌。它将东西凤凰山9个山头全揽入城中，远看就像一条巨龙沿山势起伏，忽上忽下，蔚为壮观。从地方志书上可以看到，

古东海县正式建县时间是泰始七年（471年），但县治所具体位置还是个谜。但元徽四年（476年）兴建的这座凤凰城，东海县衙及时迁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这座凤凰城一筑，奠定了东西凤凰山下这片土地政治、军事与历史地位。从元徽四年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这808年间，这里一直是历史上的东海县治所，并为历朝重要的营防重地。

刘善明虽为州官、刺史，又出身北方豪户，但为人低调，时刻不忘怜弱济贫。他的居所，是“茅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剗削（即粗加工）”。在他没来郁州之前，原青州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人相食”，“家有积粟”的刘善明果断开仓赈灾。每日还支起几口大锅，煮粥分施于那些沿街乞讨的人员。当时的一些穷苦百姓称刘善明家的田为“续命田”。

建元元年（479年），齐高帝登基。一向为齐高帝所赏识的刘善民，出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然而，上任不到两年，刘善明就因病辞世，年仅49岁。

由于他为人豪爽，连年赈灾，死后“家无遗储”，“唯有图书8000卷”。当时的齐高帝闻他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下诏曰：“善明忠诚夙愿，干力兼宣，豫经夷险，勤绩昭著。不幸殒丧，痛悼于怀。”追封他为左将军、豫州刺史，并谥烈伯号。视其家庭清贫，赐谷500斛。

刘善明有治名，亦有文名。著有文集10卷行于世。

（作者通联：海州区郁州南路169号景山秀水二期c5-2-501）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孙佳讯谈板浦“二许”与李汝珍

许燕鎏

孙佳讯,1908年生于灌云县中正后滩(今属海州区宁海街道),中共党员,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全国著名的民间故事和童话作家,研究《镜花缘》的著名学者,曾任板浦中学校长、《江苏教育》编辑等职,1990年病逝。

板浦“二许”,是指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许乔林、许桂林兄弟二人。许乔林14岁考取秀才,许桂林12岁考取秀才,后又双双乡试中举,史称“东海二宝”。许乔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江淮学者,争出其门”,他在任山东泰安府平阴县知县期间,创办了云门书院,为官清正廉明,勤政办学,当地人称之为“许青天”。兄弟二人著作颇丰,仅许桂林一生可考书目有40种160卷。许桂林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经学家、数学家,被编入《畴人传》,与中外450多位科学家并列齐名。

李汝珍(1763—1830),原籍直隶大兴人(今属北京),20岁左右随兄李汝璜来到板浦,居住在板浦场盐课司大使任所,并续娶许乔林堂姐为妻,与板浦“二许”成了“姻亲挚友”。先后在板浦生活30多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镜花缘》一书。

对板浦“二许”与李汝珍的关系,特别是为创作《镜花缘》一书,和许乔林编的《胸海诗存》,社会上许多误解、误传,笔者近来翻阅孙佳讯一些著作和有关史志书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一点看法,与读者共同商榷。

对《镜花缘》作者一事,各种传说由来已久。早在1928年孙佳

讯给著名学者胡适的回信中,就列举7种说法:二许兄弟所作;二许二乔与李氏凑趣而作;李氏有一书,与许氏《镜花缘》交换而署名的;二许卖版权与李氏的;被李氏诈取的;二许匿名藉李氏以传;系一无名人所作,为二许兄弟所改正。

对于这些说法,孙佳讯断言:“都是没有根据的。”由于海属地区传言较多,弄得胡适与海属学者吴鲁星等人也将信将疑,甚至搜集证据,确认《镜花缘》的作者为许氏兄弟。

孙佳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纠正谬误,到处搜求二许及李汝珍有关遗书、遗稿、信件等有关史料。1933年孙佳讯在板浦嵯商韩子通家,发现李汝珍亲笔复许乔林的信,信中说:“(《镜花缘》)日前虽已完稿……酒令部分尚需改动……刻下本已敷衍了卷——俟抄完,当即专人送呈斧正。”孙佳讯即认定《镜花缘》是李汝珍所作。随后,孙佳讯旗帜鲜明地写出有关文稿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

另,孙佳讯的《李汝珍在板浦》一文,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许乔林说过,在板浦‘久作寓公’的李汝珍,留下的三部著作——《李氏音鉴》《镜花缘》《受子谱》都是在板浦成书的。”

以上孙佳讯两处文稿可以说明,历史上“二许”与李汝珍对《镜花缘》的著作权,并无争议。

再者,《镜花缘》的序言是许乔林所写,这是白纸落上黑字的,是社会公认的。许乔林在序中,对

李汝珍《镜花缘》一书还大加赞扬,说他是“枕经菲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试想,许乔林若要争夺著作权,能为李汝珍写出如此赞美的序言吗?

孙佳讯《镜花缘》补考一文,还提到“解释海属《镜花缘》传说的成因,将来当为一文,与之商榷。”可惜现在未能见到此文,不知佳讯先生事后是否完成此文。如得此文,种种传说的由来,更能真相大白。

关于许乔林编的《胸海诗存》为什么不收录李汝珍的诗,在佳讯先生《镜花缘》补考一文中,也作了说明。许乔林写的《胸海诗存凡例》共二十四则,佳讯先生从中引用,其第四则云:“文章公是公非,定于生后,凡其人见存者,虽皓首骚坛,概不登选。”此则说人还在世,诗稿不入选。凡例第七则又云:“夫十步之内,必有芳兰,岂必借才异地呼?此集流寓之诗,采之綦谨,如张尧峰、杨铁星、李松石(即李汝珍)、吴子野诸君,虽久作寓公,诗名籍甚,概所不录。”这说明虽久居本地没有入籍者,诗稿也不收录。

《胸海诗存》流寓栏内有凌廷堪的诗,为什么不录李汝珍的诗呢?在佳讯先生的文中,也作了解释:“这是说流寓之子孙入籍于胸海者,其先人之诗,得入选。”凌廷堪为乾隆间进士,一代礼、经学大师,淮海地区当时的文化受他影响颇大。他祖籍安徽歙县,祖母板浦许氏,祖父死后,父亲一直在板浦谋生。凌廷堪出生在板浦,却老于海州(今灌云伊芦山下有其故居,后人多业农)。凌的子孙后代均入籍本地。而李汝珍,虽在板浦陆续生活三十年左右,但并未入籍,也无子孙后代留在本地,这是与凌廷堪的不同之处。而且如李汝珍未入本地籍也并非一人,与之相同的也未被选入《胸海诗存》,所以不能简单的猜测误解,是李汝珍得罪了许乔林而未被录选。

在传说中,还讲到“二许”与李汝珍之间有猜忌,关系不好。孙佳讯的几篇文章中都讲他们之间关系亲密,说李汝珍与“二许不仅是好友,而且是亲戚呢”。李汝珍《镜花缘》完稿,当即派专人送呈许乔林斧正。许乔林不仅审阅全稿,还增删某些段落,并为此写了序言,大加赞扬李汝珍聪明绝世,写出奇

书。孙佳讯在文中还写“李汝珍和许桂林相处尤其密切”。李汝珍在著《李氏音鉴》中说:“月南(即许桂林)为珍内弟,撰《说音》一篇,珍与南音之辨,得月南之益多矣。”许桂林在给《音鉴》写的后序中说:“松石(即李汝珍)姨夫,博学多能,方在胸时,与余契好尤笃。尝纵谈音理,上下其说,座客目瞪口呆,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由此可以想见他俩关系的密切。

至于李汝珍与“二许”经济上的关系,几百年前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二许”在板浦是大户人家,既有“旗杆许”的兴旺之期,也有家境衰落之时。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二许”之父许兆升,因在南河水利治理失利,受到皇上处罚。志书中这样记述:“(许兆升)因前浚运河分赔万二千金,部议籍产,乃赤贫。”这说明已经倾家荡产了,贫困之极,这是“二许”家的困难时期。

在佳讯先生文中,还记载许桂林在《北堂永慕记》文中的一段话:嘉庆五年(1800年)“乔林客两淮海州盐运分公司运判邓鸣岗先生处,桂林客板浦场盐课司大使李佛云(即李汝璜)处,各以授徒谋薄养。”这也说明此时“二许”家的境况也不富足。

佳讯先生是研究《镜花缘》的著名学者,他近百年前的考证和文稿,应该可信。对历史名人,也要包容,要放到历史境况下去研究、推理,要学习孙佳讯先生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精神,一定要有真凭实据,认真细致的研究,再下结论。切不可只听片言只语,凭空猜测推定。

古老的板浦镇,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是我们家乡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大力宣扬,切不可只高抬一方,贬低、忽视另一方,影响地方声誉,有碍地方发展。

《板浦春秋》作者姚祥麟先生等人提议创建板浦历代名人馆,这是一个很好的有远见的建议。只有更多地如实介绍板浦历史名人,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人文资源的优势,推动古镇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五)

——明清时期海州的行政机构设置(上)

刘凤桂

明代中央政府的政治架构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起家的朱元璋,公元1368年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上,明初基本沿袭元制,洪武九年(1376年)以后开始改革,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朝特色的中央——地方多种层级管理结构,从而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一)六部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设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属丞相管理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

(二)监察

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前,明朝仍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3~5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13道,共有110人。

(三)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设都给事中6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

以不赞成皇帝的旨意,使这一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四)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

(五)内阁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1384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某某内阁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以后内阁成为制约皇帝权力的常制。

(六)锦衣卫与东西厂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成立。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力量,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成化十八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瑾,刘瑾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七)其他机构

包括三公、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等。

明代的行省制度

明初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和直隶州，府以下有县和属州，各州以下有县，形成了一个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大体格局。明初设置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称“三司”，为三分各省军政司法的权力制约体系，后逐渐被巡抚制度接掌，巡抚常常成为各省权力统一的最高长官。

明代在全国设15个省级单位，布政使司以下，改元朝的路为府，成为主要的二级行政区划，但是同时又有直属于省的直隶州，行政级别等同于府。都指挥使司方面，共有16个都司、5个行都司、2个留守司。16个都司中，有13个都司与布政使司同名，其他3个分别是北直隶境内的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山东省的辽东都司，相当于清的直隶省，辖境相当现在的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南直隶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5个行都司分别是陕西、四川、湖广、福建、山西。2个留守司是中都留守司和兴都留守司。

明代的地方行政结构

明代总体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区划。明朝建立后，大体继承元代行省制，省以下有路、府、州、县，但后来有所改革，即取消了路的建制，仅设府、州、县三级(亦有部分府、县二级)管理机构，较元代更为简化。府之上隶于京师或布政使司，下辖州、县，为地方三级行政机构和区划。边远地区以府兼辖军户者称军民府，其地位高于府，其中部分为土府。两京及各布政使司，一般分别设数府或十余府。州有直隶州和属州两种。直隶州上隶于京师或各布政使司，地位视府；属州上隶于府，地位视县，但多数属州也领有县，实际介于府与县之间。直隶州和属州或下领县，或不领县，县上隶于府、直隶州或属州。每府辖数县至二十余县不等(包括属州所领县)，领县的直隶州或属州，则一般每州辖一县或五、六县。府、州、县除上属布政使司外，又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派遣机构分守、分

巡、整饬兵备道的节制。

明代海州的州县设置及管理机构

明代海州属淮安府，实行的是州管县行政管理方式。明初，元代海宁州治下的朐山县省入海州，领赣榆一县。元代沭阳属海宁州，明改成为属淮安府直管的二级管理机构。

明代海州设知州一员，为一州之长。设同知(副职)一员、管粮判官一员、治农吏目一员、巡捕管狱一员(天启年间裁削)。又设管理治安和税赋的判官一员，管理儒学的学正一员、训导三员。为缉防私盐，分别在东海、高桥、慧泽设巡检司各一员；设辅助管粮判官的通济、永济两仓副使各一员(天启初裁削)；设医学典术(负责管理医药卫生)、阴阳学典术(负责公共建筑堪舆)吏胥各一员；在卢家庄、驼峰各设吏胥一名，归州判领辖；在兴国庄驿设驿丞一员，州设税课局吏胥一名、河泊所吏胥一名，归州判领辖。明末，皆裁废。管理宗教事务的有僧正司、道正司机构，各设吏胥一名。

明代实行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制。明海州为直隶州，按《明史·职官表》，知州为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吏胥视府制设分管钱粮、赋税、水利、儒学、邮驿、治安的“六房”，分属州判、治农吏目、巡捕管辖，属政府聘用人员，“未入流”(无品级)。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体制外不在编人员，且各房定员无常制，“俱视其繁简以供厥职”。所以海州的州级职官设置并不完全与明代职官表所列相一致。有明一代，海州共有知州72人、同知36人、州判43人。同知与州判显然有缺额。像永乐、正统、景泰、顺天几朝就未派同知来海州；崇祯朝，同知、州判皆未派；万历九年(1581年)派州判，至二十六年(1598年)计15年未派州判。

明代赣榆县的机构设置

明代赣榆县属海州，而总隶于淮安府。按明制，设知县一，为一县之长；设县丞一，为副职；主簿二：一管马(宣德年裁)，一管治农(万历年裁)；设典史、教谕、训导、阴阳学训术、医学训学、僧会等各一，分管县内仪礼、教育、建筑堪舆、医药卫生及宗教事务等。又设临洪、菽水(今山东日照岚山)司巡检各一，设兴庄场课盐司大使一。原设东海驿、上庄驿、王防驿驿丞各一；中岗站递运所大使、分水岭递运大使



各一；课税局大使一，后皆裁（大约在崇祯年间）。

明代海州的盐官

明代设两淮都转运使司，掌盐鹽（盐池）之事，由州同知与副判分司之，督各场仓盐课司。共奉巡盐御史或盐法道臣。都转运使司下设判官专管盐务，从六品。这是一个从属于淮安府的较高职务，可见明政府对两淮盐业和盐税的重视。各盐场设课盐司大使和盐仓大使及副使，无品秩、未入流，相当于州级聘用的胥吏，由州副判统辖之。明初，海州有临洪、板浦、徐渎、莞渎四个盐场，设课盐大使和副使各一员，直隶于两淮都转运使司，但在有关政令上隶属于州，即是说海州对他们有行政代管权。后又新设天赐盐场、兴庄盐场，盐务管理仍依旧例。

明代海州的武备军事机构

明代，统兵之制大略有都督府、镇戍将领、督抚兵备三方。后分大都督府，按驻军所在地域位置建左、右、中、前、后五军。海州设海州千户所及东、西千户所，隶属京师中军都督府。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海设把总一员，督抚兵备，以文臣监督，提督漕运。因倭寇进犯骚扰，又增设备倭千总，守御东、西二海。据清《嘉庆海州志》引《陈宣州志》，海州旧址有东、西二所及千户镇抚，百户守御城池，官皆世袭。自关白作乱，始将云梯关把总移至东海凤凰城（今南城），即为东海所。万历二十年（1592年），倭寇进犯朝鲜，明政府加强东部海防，增设水陆三营驻东海（今云台山），崇祯十六年（1643年）升把总为守备。

明代的海州乡镇、城坊建置

明朝建立后，以人户为中心建立了乡、都、图、（里）的地方基层组织。始于北宋的都保在明代被都图代替。都保以地域划分为主，属鱼鳞图册系统；都图则以人户划分为主，属黄册里甲系统。图亦即里，每图或每里之下又置有十甲，因此这种编制被称为里甲制或图甲制。规定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余百户为十甲，一甲十户，名全图。一甲不足十户，名半图。乡都曰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

里长为甲首，其职责主要是“催办钱粮，勾摄公务”。明朝统治秩序建立后，作为军事制度的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渐推行，凡重要地方设卫，次要地

方设所。卫设指挥，所设千户、百户，统领本卫所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受到破坏，亦兵亦农的乡兵应运而生，成为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乡兵组织，因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呈不同形式，主要有团练、义兵、宗法武装等。它们组成乡村防御体系，成为保护乡里的重要力量。明代的乡里教育十分发达，官府专门设立了许多乡村社学对乡里民众进行教育。教学内容除教授识字和一般生活知识、历史故事外，也灌输儒家纲常伦理道德观念，咏读经书，以利于加强对地方的思想统治。一般由通儒学的乡绅承担。

明初，海州编为百六里，因人口大量逃亡，后编为六十里，谓之“都图”。里甲十年一役，养马十二匹以应走递，皂隶六十名以应差遣。

明代的海州集镇，弘治前规模颇大。之后，因地广多盗，聚数十家而为镇者比较普遍，至于散居在村落以便田事者，不过四五家，与镇之间互为声援。一般的镇设老人两名，大的镇四五名，择老成晓事者为之。主要承担勾摄游徼之责，即沟通与邻镇之间的联系，摄理镇务，调解纠纷，察举坏人。由官府制定规则进行约束，使之不至于为害地方。这是一种在州、县督察下的乡村自治形式。据清《嘉庆海州志》统计，明代海州共有51镇，到清初废去3镇，为48镇。今知名的龙苴、板浦、张店、新安、石榴、石埠、驼峰、横沟、安峰、平明、房山、沙河诸镇，皆是明代海州旧镇。镇的功能循“保甲法”，负责催科（即催缴田赋）、勾摄、稽察、缉捕等事务。

海州城在弘治（1488年）前，社会比较稳定，自然灾害也少，平民百姓生活“衣食饶裕，弦歌之声不绝”。街、市、坊、巷有：十字街，四通皆有市，逢规定日集市，利民之便。有东市桥街、北市桥街、西门外街。西门外街通去淮安官道，故比其他市繁盛。又有较多的营房小巷通十字街。另有敦化坊、时雍坊、惠泽坊、阜民坊、西城坊、丰润坊、崇礼坊、威武坊、永宁坊等坊，遍布海州城内外。还有“承流”“宣化”“淮北重郡”“海上名邦”四坊建在州衙大门左右；“攀龙附凤”“起凤腾蛟”二坊建在儒学左右；明进士张朝瑞、丁泰、乙瑄等人还建有“兴贤”“大司徒”“育秀”三坊。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胸海书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方志编纂创新

徐学鸿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党中央积极发展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全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延伸，贯穿欧亚大陆，东接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涉及 60 多个国家的 44 亿人口。从文化层面上看，“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传播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方志作为“代代相续，永不断章”的文化事业，应该不断创新，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成果不断涌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正不断加强。“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互鉴、文化交融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共同发展的倡议，更是文化对话的倡议。各种形式的自贸区、经济合作区不断涌现，整个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金融、文化等诸多方面，诸如，区域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建立，沿途沿线重点国家和地区海关务实国际合作、执法合作、在自贸协定项下的制度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的得失成败，为方志编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厚的资源。与传统上的方志比较而言，新时期方志的记述视野更为广阔，记述范围更为广阔。另一方面，在区域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民族文化的碰撞与摩擦、老龄

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断产生。这为我国的方志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的课题、新的领域大量呈现在方志工作者的面前。

当前对“一带一路”相关的文化专题研究呈现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文化研究的范围扩大。在“一带一路”文化视域之下，“国内与国外、东部与西部、边疆和内地之间将形成民众交往、交融的新态势，各民族的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一方全史”“一地百科全书”“一方古今总览”的方志，不少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积极开展文化对话，初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和谐并存、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二是文化研究呈现精细化的态势。不少地方志研究部门开展诸如“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宁夏与丝绸之路”“敦煌与丝绸之路”等文化专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延展了传统方志的研究领域。

二

方志是时代精神与时代文化的体现，承担着记载和传播时代精神与时代文化的重任。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方志编纂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与“一带一路”倡议架构相合拍，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机，紧密联系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着力研究与打造方志编纂的特色文化品牌，成为各级领导决策的地情书、民族文明的交流史。笔者认为，当前的方志编纂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志编纂应注重文化元素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涉及多元区域性的不同文化，主要有



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中东文化圈和以“东正文化”“基督文化”为核心的东欧文化圈。四大文化圈在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其相互交往过程中必然出现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影响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由此也必然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合作的阻碍,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方志作为记载某一区域的资源分布、地理气候、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自然社会的基本资料书籍,是人们了解当地的地域特点、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其中,方志更应关注文化元素。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由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在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就囊括了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和青海、甘肃、云南等多民族省份,基本涵盖了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则更大,审美情趣大相径庭。“‘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

在“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方志编纂应更多关注不同民族间文化的普世性,如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商道文化等,这对民族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方志编纂的文化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大类:一是乡风民俗类。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其宗教、丧葬、饮食、节日、崇祀、巫术等方面不同,乡风民俗不一。二是民间歌舞、民谣、民间传说和民间手工艺等文艺类。三是民族语、方言土语类。方志编纂的重点应在民族志、风俗志、宗教志等方面,真正让方志成为研究地情、人情的资料库。

(二)方志编纂应更注重现代传播形式

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随着文化内容的不断扩展和表现形式的不断变异,传统方志的阅读受众越来越少,影响力越来越小。为此,方志要进一步拓展视野,运用好现代传媒技术,放大方志的文化功能。

一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推进“互联

网+”模式下的方志文化发展方式,提升方志记述的时代性和及时性,努力将方志成果数字化、网络化,打造数字方志,建立方志地情数据库,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使全球的各界人士随时能进入网上虚拟方志馆查阅所需的资料。

二是加大方志的多语翻译力度。方志虽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典籍,但因受众范围过小等因素,目前的方志翻译工作几乎为零,在国外的图书馆藏里都是以中文原版形式被收藏。让方志走向国门,发挥文化交流的功能,就必须加大方志的翻译力度,为他国读志用志提供便捷的条件,也有助于对一些西方媒体歪曲甚至妖魔化中国形象进行回击。

(三)方志编纂应注重社会道德力量的弘扬

开放、包容、互信、合作是丝绸之路的核心精神元素。“一带一路”卓有成效的推进,需要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道德力量的支撑,才能真正让沿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辉映、激荡汇合。为此,方志编纂既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又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彰显民族文化的辉煌灿烂,更要特别深入挖掘“一带一路”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力量,以此鼓励更多的人参与“一带一路”文化交往之中。方志编纂一方面要对古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使者进行挖掘,丰富方志中的人物记载。如撰写《西游录》的元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耶律楚材,编纂《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元朝李志常,最早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旅行家的元朝人列班·扫马,等等。另一方面,方志还要加大对“一带一路”交往中出现的民族团结类型的先进人物的记述,以此来弘扬民族交往的正能量。

(四)方志编纂应注重吸纳他国文献的记述特长

由于各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历史的记述各有特色。我国的方志记述不仅要传承本土的“秉笔直书”的传统外,还要多维借鉴他国有关史实的记述方法和技巧,加强对沿线国家的方志类志书的研究,取长补短,洋为中用,特别是他国的综合年鉴、专业年鉴、行业年鉴的编修特长,广泛加以吸纳,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方志的记述体例和方法。

(作者单位:赣榆区史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心系桑梓的王公珣

张树庄



王公珣、丁少兰夫妇

王公珣(1903—1983),原名宗璠,字公珣,以字行。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于墟沟镇。1921年中学毕业。1922年秋,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文学系,于1925年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奉命赴宁,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供职,曾任丰县党部特派员。先后任丰县、萧县、铜山县县长。任间,破陋习,简繁政,除民害,修百里干河,深受三县人民的爱戴。1935,升任江苏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地淞江。1937年11月6日,王公珣接到命令,协助40军、67军坚守淞江三日,付出血的代价,保证了东线军队的安全撤退。1937年冬,王公珣调任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8年,

擢任省秘书长。1939年3月3日,任江苏省民政厅长,兼徐海行政公署主任。1944初,辞去职务,辗转去重庆,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督导委员。1945年元月起,出任江苏省政务厅长。8月,日军投降,赴吴县接收政权。1946春,复任江苏省民政厅长。1948年初,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王公珣携家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

王公珣自小在外读书、供职,奔波于大江南北,辗转于江苏内外,但他始终萦念着自己的故乡。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积极了解和参与家乡的建设,

为家乡的百姓谋福祉,至今家乡人民对他还念念不忘。

到连岛参观海港测量处

1920年,王公珣在海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读书,暑假放学回家,父亲王同甫对王公珣说:“现在有一位荷兰籍的工程师王敦伯洛克,据说是国际知名的专家,如今在西连岛上带领一些员工,进行海港测量和计划。你应该去看一看,学习人家栉风沐雨的艰苦奋斗精神。”

连岛上的海港测量处就设在西连岛的镇海寺内。王敦伯洛克热情地接到了渡海而来的王公珣,



并将建港计划的蓝图展示给他们看。蓝图上标示着由云台山北麓涛练嘴由东向西的海面上,计划建造十个以上的码头,其长宽度及距离,均有详细的记录及说明。已具雏形并待诞生的海港呈现在王公琦的面前,让王公琦激动不已,为家乡将来的变化而骄傲。

这次参观,使王公琦将这些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专家们作为自己的榜样,树立了为家乡建设出力的理想。

与钱宗泽的忘年交

钱宗泽(1891—1940),字慕霖,浙江省杭州人。中华民国陆军大学第五期学员。1926年3月任津浦路局副局长兼军事管理处处长。1930年2月任陇海路局局长,1939年7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1940年3月22日任运输总监部总司令,同年7月31日病逝于重庆。

在征用墟沟土地以修筑陇海铁路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麻烦,这些问题后来都是王公琦的父亲王同甫从中调停,最后得以圆满解决。钱宗泽与王同甫在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莫逆之交。因此,王公琦对钱宗泽以父视之,又因志趣相同,终成为忘年交。

1932年,王公琦在徐州创办私立立达女子中学,由夫人丁少兰任校长,由钱宗泽任董事长。陇海铁路修经萧县北境时,王公琦正在萧县任县长,他俩时常在徐州晤面,钱宗泽多次谈及陇海铁路和连云港的建设问题。钱宗泽说:“不论怎样困难,我发誓要把海港的码头做起来,自力更生!还要把山东台儿庄到邳县运河旁的赵墩,做一条台赵支路,接上我们的陇海线。一定要把台儿庄中兴煤矿的煤,争取过来由海港出口。”

此后,一两年的时间,钱宗泽除对陇海路经营管理外,对该路向东延伸的终端海港建设、管理颇费心血,急谋擘画,奔走呼唤,付诸行动。1933年7月开始的老窑建港计划,只是一座码头3个泊位及其他配套设施。在钱宗泽的努力下,当年下半年与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合作,获得该矿巨额垫款建造老窑煤炭专用码头1座(即2号码头)计3个泊位及

配套设施,同时又修筑了台儿庄至东陇海铁路赵墩支线31公里(即台赵支线),一改枣庄煤炭由薛城南下浦口或经徐州换轨转运运河南下之旧线,路矿双方均获益不浅。

1933年,有一次钱宗泽在陇海路的火车上,由海州赴郑州的途中经过徐州,约王公琦到车上一谈,钱宗泽兴致勃勃地对王公琦说:“海港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尤其开掘孙家山的铁路山洞,两面施工,到中间相会处,几乎密切吻合,差距极微。”接着又谈到:“至于这个港口,不可没有名字。这个港在云台山和东西连岛之间,因想到此,即定名为‘连云’,报请定夺。你是海港附近的人氏,特再征求意见。假如有更好的名字,不妨趁此时提出。”王公琦当时说这两个字很好,不但字面美,也切合本地风光。

筹复海州电厂

1947年,王公琦因身体不好,就医上海,于当年秋获准辞去省民政厅长一职还乡休养。这一年夏天,父亲突然去世。大资本家五叔王同显已于数年前病逝。这时王公琦夫妇和堂兄弟辈护送父母和五叔灵柩返乡,择地安葬。接着得到家住青岛的四叔首肯,便和堂兄弟们商量分家,分得数十万美元和500亩地。王公琦用这笔钱在上海置了一处住宅,又投资阜丰银行,恰逢这时国民党当局敌产处理处要处理日本军办的海州发电厂。王公琦将遗产余额约折20万美元购下海州电厂场地,购买了好多电器,准备恢复发电,造福乡里。海州电厂创建于1941年,日军投降后,该电厂已经濒于倒闭。王公琦虽然将电厂的地买下来了,要重新恢复发电,谈何容易!王公琦还没来得及筹建电厂,于第二年便随国民党政府移居台湾了。

夫妇同被选为国大代表

国民党首届国民大会定于1946年召开,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因此代表又被称为“制宪国大”代表,代表总额1200名。1946年内,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并进行了代表选举(有部分省区未完成)。



1946年春,江苏省政府迁回镇江,恢复建制,政务厅改为民政厅,王公珣留任厅长。怎奈王公珣这时已心力交瘁,染病就医,于是年秋辞职返乡休养。恰在此时地方上选举国大代表,当时连云港市代表有两个备选人,一位是新县的张松年,一位就是王公珣。张松年(1902—1995),新县人。著名的云台诗人张学瀚的次子,海属地区有名的学者。结果,由于王公珣在连云港民间威望极高,因此高票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

王公珣的夫人丁少兰,曾于抗战前在徐州以私资创办立达女子中学,亲任校长,桃李满门。抗战胜利后又应选江苏省妇女会理事长,亦同时当选为妇女职业团体的国大代表,伉俪同列议坛。

筹建连云港中学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历史上是由普爱中学、东海县立初级中学、新民中学、江苏省立连云港中学(含山东省立连云港中学)、启新中学等五所学校合并成的山东省立新海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新海中学。

原江苏省立连云港中学前身为1942年3月在安徽太和县创建的苏鲁豫皖四省边区临时中学。9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更名为国立第21中学。日本投降后,1946年6月,国立第21中学迁回徐州,由于时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珣的努力争取,7月24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批准国立第21中学更名为江苏省立连云港中学,王公珣还极力推动将学校迁至连云港,恰逢此时由日本开办的“日华酒精厂”停办。这样,暂驻徐州的省立连云港中学便搬迁墟沟,利用其厂址建校招生办学。1947年夏,初、高中同时招生,校长李简斋。1948年继续招生。解放前夕,全校已有9个班,约400名学生,是一所省属完全中学。王公珣通过努力,在家乡墟沟办起了第一所完全中学,解决了墟沟蔚云中学毕业的初中生无处继续求学的困难,为家乡培养了人才。

新海连地区解放后,新海连特区政府任命连云港市委书记李葵元兼连云港中学校长。1949年春,因革命形势需要,高中部学生全部入新海连特区建国学校学习。

笔端倾注思乡情

王公珣在台湾生活了34年,思乡之情日渐浓郁。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怀念家乡、歌颂家乡,甚至为家乡他日编写地方志,提供资料和资料线索,为重印古海州的志书写序、出钱。台湾海州同乡会创办的期刊《海州文献》的创始人即王公珣。该刊物已经出了143期,在海峡两岸影响较大。

在《海州竹枝词》里有一首《望乡关》写道:

北望乡关唱竹枝,且从南国寄相思。
吟成吩咐潮流去,莫再朝朝怨别离。

王公珣在所写的诗词中,有大量的篇幅是写家乡风物的。如《思乡》4首,《海州竹枝词》17首,《登云台山望连云港》4首,《丁巳九日怀乡》8首……

王公珣逝世后,后人将其平生所著集结成集,取名《畸园残稿》,这里有王公珣写的长文:《生之旅》,记述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其中对家乡的人和事写的非常详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地情资料。《漫谈连云港》,则把连云港的建设、连云港的成立,发生在连云港这块土地上的故事,记述得很详尽。另外像《仙山缥缈话云台》《裁海与复海》《刘备和海州》《陶渊明、苏东坡和海州》《宋江其人其事》《漫谈海州的乡音》等,对海州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追溯。

王公珣对海州方志的关心是很值得一谈的。他在台湾,翻印了一批古海州的地方志书,有《江苏省乡土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文献录》《云台新志》《沭阳乡土志》《沭阳县志》等,这些书的再版,王公珣都增加了序、跋、后记之类的文字在上面。他在《海州文献录景印后记》中写道:“客居既久,生活较为安定,而思乡之念转切。因而在我做学生时期的旧梦,又开始重温。可是在海外谈到整理和刊印乡邦文献,也有以下两种困难:其一,资料不易搜集;其二,费用尚难筹措。情势推移,自非昔比。因而这个梦,一时尚难实现。终于在同乡共同期盼和努力之下,逐渐的有一些表现。”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淮盐铁路运输

——追忆猴嘴盐业铁路

胡可明

民国 15 年(1926 年),陇海铁路修到了连云港市境内的大浦,设立了大浦火车站,此站距徐州 198.3 公里。此铁路后来成为淮盐外运外销的重要通道。

鼎盛于明清的淮盐,每年产量甚巨。清末民初,淮南盐区因海势东移,入滩海水趋淡,盐产锐减,盐本畸高,已不适宜再产海盐,国民政府遂决定逐步弃淮南而重点发展淮北盐区。此后淮盐即由原淮南淮北之两淮构成,演变为独淮北盐区以称之。由此也历史性地为后来的猴嘴盐业铁路建设和使用埋下了伏笔。

位于临洪河畔的大浦港,中居海州湾,东临中正、板浦两盐场,西与临洪盐场(今之青口盐场)隔河相望,南通蔷薇河、盐河,可与苏北诸县沟通。北接黄海,通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港埠。大浦港联陆通海的优势,故而成为淮盐的一个重要的出海口。运输能力巨大且速度快捷的火车通到了大浦,极大地作用于淮盐运输和销售的发展。国民政府盐务署出版的《中国盐政实录》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26 年起,先后有自新、生益、福泰、聚安、大陆、聚新等业鹾企业,在大浦建成 9 座码头,板浦盐场管理机关也移驻于大浦。“大浦坨建筑使用,淮盐外销每年达 21.96 万吨,超过建坨前 5 年(1921—1925)销售总量 15 万吨的 46.4%”。大浦坨地和码头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民国 21 年(1932 年)9 月 7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盐务署长朱庭祺陪同下,乘专机到

淮北盐区视察,决定由财政部拨款 140 万元,用于建坨和疏浚河道等工程,从而又促进了陈家港坨、燕尾港坨、头罾港坨、猴嘴坨的新建、翻建和扩建。这其中因猴嘴盐坨完全是政府出资建筑,故称为官坨,而其他各坨起始则是由盐商出资兴建的。当时,徐州、蚌埠等地的商人也在大浦设立多种土产公司达 41 家,大浦不仅是淮盐进出转运港口,亦有大宗的花生、黄豆、棉花、粮食、生猪等在此装船转运上海和青岛等港口城市,火车、轮船进出不断,汽笛声声,十分的兴旺繁荣。

1932 年后,临洪河逐渐淤塞,仅繁荣热闹了几年光景的大浦港步入衰落,三年后终被放弃。大浦港启用及兴盛期间,因为淮北盐产丰饶,1928 年国民党盐务会议就已经决定淮北各盐场建筑盐坨,以利存盐集中管理和便宜放送,次年初即安排建坨费用 100 万元,在淮北的板浦、中正、青口、济南四盐场盐斤售价中每担征收银元一角,冲回建坨费用。

猴嘴盐坨在宋子文 1932 年乘专机视察后即安排建设,1933 年建成。占地 600 余亩,共 14 个段位,可储存盐斤 150 万担,约 7.5 万吨。并修筑三层高炮楼两座,水门一道,吊桥一座,用于保护盐斤。铺设专用小铁路两条用于圩廩存盐集运入坨,此小铁路并未连接上陇海铁路。同时疏浚了猴嘴坨地至板浦、中正两盐场驳盐干河 58 公里和板浦盐场内部支河 72 公里。民国 24 年(1935 年),猴嘴盐坨铺设全长 2423 米双股铁路运盐专用线,连接上陇海铁路,板浦盐场(今之台北盐场)和邻近的其他



盐场盐斤开始用火车向外运输，比起水运十分快捷。

1939年3月，连云港市境被日军占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连云港后，在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的同时，为了满足经济掠夺的需要，计划掠夺盐斤65万吨，所掠夺的盐及其他物资都从连云港港口运输去日本，这就使得猴嘴盐业铁路外运淮盐其量甚微。加之产盐民众不堪日军的残酷统治，纷纷逃离盐区，致使淮盐产量大大下降，本来年产约60万吨，后来仅能产出15万吨。仅从残存数据统计，自1939年春，日军侵占淮北盐场后中，到1945年秋的6年多时间里，共掠夺淮盐50万吨输往日本，哪还有多少盐斤能按原来路线通过铁路运往淮盐销区皖豫等省呢？猴嘴盐坨及其铁路专用线因而被冷落。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淮北盐区接收人员于1945年10月到达新浦，成立了接收委员会办事处，接收了日伪华中盐业公司和淮海区盐务管理局。但因淮北盐区大部被我党我军所控制，国民党军队只控制了板浦盐场大部和中正盐场小部分地区，猴嘴盐坨及其盐业铁路专线仍不能正常运作。1948年11月至12月间，连云港和徐州相继解放，东陇海铁路重回人民手中。在新海连特区军管会领导下和陇海东段铁路临时管理委员会直接指挥下，1949年5月，徐州至连云港段铁路全线恢复通车，猴嘴盐坨铁路专用线也获得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猴嘴盐坨及其盐业铁路专用线的作用得以进一步拓展。段位扩展到24个，可堆存48条盐廩计24万吨盐斤。江苏省盐务管理局及后来的省盐业公司，将猴嘴盐坨及其铁路专用线管理机构定格为直属单位，有职工两千六七百人，每天有一千多人在这个盐坨上工作。由于在猴嘴盐坨工作的工人居住分散，每当装盐火车进站，整个猴嘴镇上空就激荡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这首歌的高亢旋律就成为了工人上班的号声，这也成为了当地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1951年5月，猴嘴至徐圩盐场的运盐河整修工程竣工。徐圩盐场、台南盐场盐斤都可通过这条运盐河直达猴嘴盐坨，装上火车外运外销。1954年，猴嘴盐坨装卸工人创造了9分钟装好一节30吨车皮的纪录，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惊人的。正

是这个猴嘴盐坨，正是这条运销海盐的铁路专用线，曾在1963年3月16日，给原板浦场盐民及整个淮北盐区的盐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乘坐专列到连云港市视察工作，列车在猴嘴坨地盐业专用线停靠，接见了淮北盐场和盐区工委负责人安岳、匡裕悦。1965年，猴嘴铁路专用线集装盐斤使用上了自动计量器，使散装盐上火车有了计量。其后，机械化作业程度大力改进，装卸速度和筑装质量大幅提高，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从1971—1976年，猴嘴盐坨铁路专用线共运出淮盐300.45万吨。1980年，猴嘴盐坨又使用上了空气吸盐机，从运盐船上将散装盐斤直接吸上坨地盐廩。同时拥有各类装卸盐皮带机100多台，另有相应配套数量的扒舱机、补包机、趸船、斗轮机、计量器等，都为盐斤装运火车缩短了时间，提高了效率。1989年，为适应铁路内燃机车运营要求，江苏省盐业公司投资更换其专用线钢轨945米，并对相关道口及排水系统进行整修。较高程度机械化作业，巨量淮盐在此集运和外销，使猴嘴盐坨成为名副其实的“江苏盐都”。据《江苏省志·盐业志》给出的数据，1978—1995年猴嘴盐业铁路专用线共向外发运盐斤1000.60万吨，其中最高纪录是年外运80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猴嘴盐业铁路共向淮盐销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发运淮盐2000多万吨，为国家建设、为连云港财政和连云港地区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改善都作出过重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因连云港碱厂建成投产，淮北盐场的盐斤大部分由其购入，猴嘴坨地及盐业铁路专用线作用渐显萎缩，最终归入历史性地衰落。但在2008—2009年中，经过努力，国家铁道部批准，这条盐业铁路还扩充了业务范围，由单一的维持少量盐运，增加了粮食、煤炭、化肥、钢材、木材等11项物资转运，具有光荣历史的盐坨和盐业铁路专用线像一颗加时的流星，余辉闪烁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

（作者单位：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赣榆许家花园

葛永明

赣榆古代园林,当首推青口许家花园。其规模之宏大,布局之精巧,即使县城官衙亦无出其右。

许家花园为清末江北名士许鼎霖所建。

许鼎霖,字久香,青口镇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光绪十六年调任内阁撰文,光绪十九年九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任清政府驻秘鲁领事。回国后,先后在皖、浙两省为官,颇有政声。力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与清末状元张謇等人合资创建耀徐玻璃公司,产品曾在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许鼎霖与南通张謇、海州沈云沛先后合资创建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海丰面粉公司、赣丰饼油公司、海赣垦牧公司等实业十余家,志在实业救国。清政府赏其正二品封典,以示嘉奖,宣统三年(1911)晋升为一品。许鼎霖、张謇、沈云沛被誉为“江北三杰”。民国初年,许鼎霖当选江苏省议会议长。

1904年,官运亨通、事业有成、权力和财富均近鼎盛的许鼎霖派专人在家乡青口营建了私人园林——许家花园。

许家花园位于青口城内东北角,北界青口圩城北墙,南临“马号街”(今后宫东路),面积数十亩。园内因洼疏池,引护城河水流入,池内种植荷花,故名荷花池。小桥流水,构石为山,广植花木,营建亭榭。整座花园布局颇具江南园林特色。荷池碧水澄明,

小桥流水潺潺,夹岸垂柳碧桃,庭院青松翠柏。不论春夏秋冬,许家花园碧水长流,鲜花争艳,是赣榆历史上名闻遐迩、规模最大的一座私家园林。

赣榆地处苏鲁交界,属暖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各种花草生长。许家花园借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植天南海北名花异卉上千种,其中不少为花中魁元,稀世珍品。特别是许家花园的牡丹、芍药在当时为苏北鲁南园林之最。其中有一名为“青龙卧墨池”的黑牡丹和一名为“昆山夜光”的白牡丹,尤为珍贵。据说这白牡丹盛开时,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能发出萤光,数米之外都能看见光团,故此得名。

许家花园可供观赏的名贵的松、柏、竹有数十个品种,其中稀奇名竹就有淡竹、金竹、人面竹、黑竹等十几种,更为奇特的是一种叫做佛肚竹的,高不满尺,四季清翠,节与节之间,躯干外腆,好似弥勒佛的大肚子,故此得名,是盆栽的最理想的竹类。其他珍贵的梅、兰、桂、杜鹃、茶花、海棠等花木更是品种繁多,不胜枚举。

许家花园制作假山用的石料也是优中选优,十分考究,多是从千里之外运来的。名贵的太湖石、道州石、灵璧石、英州石、桂川石也是应有尽有,各显特色。花园里还有数百种独具地方特色和融南北各派特长的观赏盆景,远近驰名,更令世人赞誉。

大慈寺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六

孙大伟

大慈寺位于海州城内十字街东首,原名大悲教寺,俗称大寺。该寺始建于宋嘉祐三年(1058年),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毁于兵患,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统十四年(1499年)两次重修,隆庆六年(1572年)知州郑复亨捐俸米十石倡修,并改大悲教寺为大慈禅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毁于火灾,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知州任兆炯倡议并主持重修,并奠定了最后的规模。

大慈寺地处闹市,建筑宏伟,佛教造像精美。寺院占地四千平方米,四进三院。在布局上,沿一条中轴线,从南往北,依次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由于地形狭长,各进内的东西两侧均没有配殿。第一进为山门,山门至中大街为“八”字形小广场,山门为五间,中间三间大殿面南,有三个门并立,中间一个大些,两侧各一门偏小,门上皆为拱券,称为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象征佛经的“三解脱门”,所以又称三门殿;山门两侧有雕刻精美的石鼓一对,券形拱门上镶嵌着古朴遒劲的“大慈禅寺”四个碑体镏金大字;山门殿内东西两侧是传说中威猛高大、驱妖斩邪的门神——哼哈二将的塑像;五

许鼎霖乡试亚元,以文致仕。宦海商场所交多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因此许家花园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许鼎霖与张謇相交甚厚,志同道合,张謇在赴京赶考中状元之前,曾受聘担任青口选青书院山长(校长),常与许恩普、许鼎霖父子及赣榆的名人贤达畅游许家花园,或赏花观景,或吟诗作画。

许家花园再次文运兴旺、学子云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1952年,赣榆县政府决定在青口恢复重建赣榆县初级中学,最初校址在青口东门里(后为东门里小学)山东省临沂专区第三速成师范,以速师为基础招收新生创办了赣榆县初级中学。新招收的两个班的学生就安排住在许家花园。1955年,赣榆县初级中学北迁扩办,以许家花园中的“后沟”为中心,沟北相继建起一排排教室和大礼堂、食堂。沟南盖起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在许家花园的老宅里安了家。昔日的许家花园更加美丽动人,古老的许家花园焕发了青春,为现代教育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
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间山门的東西两侧各一间面北，为僧房。

第二进是三间天王殿，殿内东西两侧高台上是四大金刚的塑像，即《封神演义》中描写的魔家四将，分别执宝剑、琵琶、雨伞、海貂，象征着风调雨顺；殿正中高台上面南的是肚大能容、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坐像，其背面面北而立的是手执金刚宝杵的护法神韦陀菩萨塑像。值得一提的是天王殿中的塑像特别精美，四大天王据说是国内仅有的两处用吴道子的兰图雕塑的，高大威猛的身躯比例适中，海州老一辈人对四大金刚的塑像记忆特别深刻。

天王殿向北是纵二十余米的丹墀和第三进大雄宝殿，殿高近二十米，五开间。殿内正中法台莲座上三世佛和普贤、文殊菩萨的造像，三世佛三尊塑像据说是建寺初期北宋造像大师雷潮夫妇的遗存，在国内亦属罕见；东西两侧高台上则是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造像，知觉罗汉济公，衣衫褴褛，摇着破扇，滑稽风趣；金狮罗汉，歪头咧嘴，耳环上系着一只活泼生动的小狮子……总之，各罗汉的喜、怒、哀、乐、愁、苦及凝思的各种神态，豪爽慈善、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均淋漓尽致而又活灵活现展现在游人面前，让人赞叹这些造像的艺术成就。

大殿后面为第四进藏经阁，以及方丈室和禅房。

大慈寺，千百年来一直是海州香火旺盛的佛教道场，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善男信女朝拜的圣地。自

明代起，大慈寺成为古海州境内最著名的寺院，其地位举足轻重。其原因一是地处州城内十字街至钟鼓楼的中心地段，与文庙和城隍庙比邻，寺内佛教造像华美，佛教经典收藏宏富，信众和游客造访频繁。二是洪武十五年，古海州第一次设立了佛教事务管理衙门僧正司，这个僧正司就设在大慈寺内，也相应地提升了大慈寺在政界和佛教界的地位。三是明代始，大慈寺成为海州历代州官远望皇都、举行朝贺典礼和四众弟子举行重大佛事活动的场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古海州近郊的安和寺、圣福发宁寺、国清寺及南部伊山附近的石佛寺等寺院并入大慈寺，大慈寺成为影响较大的著名佛教丛林，信众明显增多，佛事活动水平较高。

1957年，最后一位住持仁长法师离去之后，大慈寺即不再有常住僧人。1959年初，大雄宝殿挂牌“连云港市地方志陈列室”，展出海州及市内的一些文物。“文化大革命”中，大慈寺劫运难逃，雕塑精美的佛教造像被毁于一旦，藏经阁成为全区“破四旧”被抄文物的仓库，整个寺院建筑也于1971年被拆除，改建为鼓楼中学（后为海州中学宿舍）和文化馆，附近居民再也听不到晨钟暮鼓和悠扬的诵经梵唱之声。只有山门前“八”字形广场，时时勾起老一辈人们的记忆。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连云港史志》

2017年总目录

(总第 109 期~114 期)

编辑部

特载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大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
——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
滕 雯(6-04)

喜迎十九大建设新港城

筑梦东方:连云港打造“一带一路”最便捷出海口
刘成文(3-04)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 提升海洋综合实力
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局(4-04)
乐当拆迁户的“主心骨”
王一平(4-11)
运用重大典型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市委宣传部(5-04)

峥嵘岁月

访黄安舰起义亲历者
李 晗(2-08)
抗战烽火燃激情 奔赴千里把党寻
——记东海县早期党员邹华民寻党往事
李 晗(3-10)
罗荣桓南下治病经过
王晓华(4-13)

英烈风采

永恒的纪念
——追忆我市赣榆区海头镇李巷村梁氏家族 6 位烈士
梁启平(6-18)

党史研究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例
柴观珍 关九乐(1-44)
新四军军部西迁黄花塘
李锦华 韩翠林(5-11)
鲜为人知的抗战叙事长诗《恰恰和李埏》
王晓华(5-15)
抗战时期的滨海根据地军政大检阅
王晓华(6-21)

地方文化研究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
刘凤桂(1-18)
赣榆沿海港口和海岸线的变迁(下)
葛永明(1-21)
弱朝新政下的淮盐之花
胡可明(1-23)
——北宋时期的淮盐发展
刘凤桂(2-13)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一)
再说李汝珍
李洪甫(2-16)
——纪念《镜花缘》成书 200 年
张树庄(2-19)
林廷玉诗吟海州八景
葛永明 杨桂珍(2-22)
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
闫祥富(3-15)
圆仁入海州路详解
胡可明(3-19)
淮盐与古海州水运
刘凤桂(3-23)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二)
黄窝碑刻
胡可才(3-26)
话说“贡品”古安梨
蔡立志(4-37)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三)
刘凤桂(4-40)
陶澍与淮北盐场税制改革
殷 然 夏小丹(5-26)
沧桑留痕著地名
韩世泳(5-30)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四)
刘凤桂(5-34)
孙佳讯谈板浦“二许”与李汝珍
许燕鑫(6-32)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五)
刘凤桂(6-34)



郁洲溯源

- “赣榆”来源于赐名“榆” 祝新华(1-27)
 连云港市名称与区域范围的变迁 许燕鎏(1-30)
 桃源盛境话宿城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九 伏广喜 闫祥富(1-32)
 东山旧事从头说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二十 伏广喜 闫祥富(2-26)
 栖霞山之名探源 蒋金明(2-29)
 南北朝义塘郡诸县治所及辖境考 孙 铭(2-31)
 莒国初都计斤城 孙 铭(3-32)
 连云港市境内的望海楼 蔡立志(3-35)
 海州二营巷的得名 宋继奎(3-38)
 桑田沧海 水下名城
 ——春秋时期莒国纪鄆城 孙 铭(4-20)
 银山堆出新坝镇 张树庄(4-23)
 也说海州“二营巷” 韩世泳(4-26)
 寻访石湫古镇 韩世泳(6-24)
 灌南第一所小学的前世今生 耿中太 韩翠林(6-29)
 刘善明首筑凤凰城 伏广喜(6-31)

国学讲义

- 修身如玉待时飞
 ——孔子儒行解析 鱼 禾(1-13)
 臣道千古第一人
 ——元圣伊尹及《尚书·商书》五篇 鱼 禾(2-04)
 先民心声 质朴情怀
 ——先秦古诗五首 鱼 禾(3-29)
 好善无厌 受谏而诚
 ——读《荀子·修身》篇 鱼 禾(4-16)

史海钩沉

- 寻觅于公故里 张树庄(1-35)
 云台山历史上的各种称谓 蔡立志(1-37)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蔡立志(2-36)
 智斗顽敌保军需
 ——记滨海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抗争 祝新华(2-38)
 公章的由来 王 一(2-40)

历史与发展

- “善后河”名应予以保护 韩世泳(1-40)
 赣榆名称由来新说与徐福东渡精神的传承 刘成文(6-09)
 “桥头堡”之争 薛广东(6-12)
 沈云沛与云雾茶 蔡立志(6-15)

往事追忆

- 新华书店买书记 王宗富(1-42)
 我的“三同”生活 蔡立志(5-22)
 淮盐铁路运输
 ——追忆猴嘴盐业铁路 胡可明(6-42)

史志论坛

- 为中国抗战史正名:不是否定是还原 新华视点(1-04)
 来自大别山的红色印记 韩翠林(1-06)
 微信公众平台在党史宣传教育中的实践
 ——以连云港史志微信公众号为例 于冰清(1-09)
 保护乡土文化 留住家园情怀
 ——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思考 韩翠林(2-11)
 为灌南脉动而歌
 ——《灌南年鉴》创刊20周年随想 韩翠林(3-13)
 传承传统文化地方志大有可为
 ——学习《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思考 黄瑞栋(4-29)
 五大发展理念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 赵维娜(4-33)
 东海县推动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张守忠(5-19)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方志编纂创新 徐学鸿(6-37)

人物春秋

- 诗人杨廷镇 刘洪雨(3-36)
 心系桑梓的王公琦 张树庄(6-39)

风物览胜

- 从碧霞宫到碧霞寺
 ——九庵十八庙录踪之一 孙大伟(1-47)
 锦屏山散记 韩世泳(2-43)
 海州的观音道场
 ——九庵十八庙之二 孙大伟(2-47)
 话说海州饼 韩世泳(3-41)
 青口老街 葛永明(3-43)
 见证沧海桑田的龙洞庵
 ——九庵十八庙之三 孙大伟(3-47)
 赣榆山名来历有典故传说(上) 葛永明(4-43)
 海州城隍庙原址重建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四 孙大伟(4-47)
 赣榆山名来历与典故传说(下) 葛永明(5-38)
 海州文庙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五 孙大伟(5-42)
 赣榆许家花园 葛永明(6-44)
 大慈寺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六 孙大伟(6-45)

